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4B

JUL 28 1959

5061/5600.1

27-18

(1953)

# 中國語文

一九五三年 一月號

7



c317

~~c.318~~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 中國語文一九五三年一月號 目錄

### 語文評論

從字母研究向前推進一步……………伯韓(3)

### 討論和研究

一些簡單的意見……………葉聖陶(4)

新聞語言必須接近民衆……………鄭之東(6)

關於新聞語言的幾個具體問題……………藍鈺(11)

報紙語文必須注意純潔和健康……………朱伯石(13)

我對於新聞語言和廣播語言的一點意見……………程天民(15)

### 語文知識講話

語法講話(七)……………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16)

廣西僮族的方塊文字……………韋慶穩(21)

### 語文教學

在語文教學中怎樣講解作品的思想和感情……………陳傳忠(23)

語文課堂教學的幾個主要體驗(下)……………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連成中學教務處(26)

### 譯述

《語言學引論》教學大綱……………蘇聯高等教育部大學總管理處批准  
李 羨 林 譯 (30)

### 報道·消息

本社召開新聞語言問題座談會……………(33)

### 書刊評介

評慧先著《語法講話》……………陳安叔(35)



## 從字母研究向前推進一步

研究漢字改革方案的人很多，還在五四運動以前，就是三十多年以前，光說自創字母的就有四十家以上。採用現成的國際通用字母的以及非拼音的都不在內。這只是見於記載的，遺漏的一定還有。一九四九年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以來，各地方提出方案的又有二百二十幾家。去年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以後，收到各方面寄來的方案或關於方案的意見，又有一百四十餘件。這些方案的研究者，其中有不少的人是在生活十分困苦、參考資料又不容易找到的情況下進行研究的，他們不顧一切困難，花一輩子的功夫來摸索，終於各自創造出一套新文字的方案，這種為人民文化事業服務的精神是極可敬佩的。

可是由於這種個人研究，不能跟不同時和不同地方的人聯繫，就難免用了許多重複的工夫，或者拼命鑽牛角尖，跟現實脫節，都不免浪費了人力。就我們看到的材料說，漢字改革工作中關於字母方案的個人研究，已經達到了盡頭，再要發展下去，只能在原有的園地上兜圈子，決不可能有什麼“新發明”了。今天以後，關於漢字改革問題的個人研究，似乎應該轉到語詞方面去，不必再在字母上多用心思了。

字母和拼音的方案只能有幾個類型，許多大同小異的設計都不過是這些類型中的支流別派。這種形勢在三十多年以前就大致確定了。各種方案，首先可以分成採用國際字母和自創字母的兩大類。自創字母又可以分成根據漢字形式和不根據漢字形式的兩類。不根據漢字形式的字母可以任意創造，它的設計可以多得無限，但是主要的只有象數系和速記系兩種。象數系好像八卦一樣，是先設定幾種基本筆畫，然後拿它配合，演變成各種字母的；也有用數碼代替字母的。速記系還要顧到寫的快（但不顧到排印的方便），所用的筆畫是極簡單的線條，靠長短粗細位置方向等來分別，而且把聲母韻母連在一起。根據我們目前文字改革的總方針，這些個不根據漢字形式而任意創造的字母，是難以採用的。因為任何新的文字都是根據舊的文字創造的，無論是採用國際形式或採用民族形式，總之要找一個根據。例如歐洲各國文字的字母是從希臘字母拉丁字母演變成的，日本字母是根據漢字製造的。有了一

種根據，就會有一部份人感到這種文字“似曾相識”，容易接受它；推行這種文字就不會太困難。就國際形式和民族形式這兩種根據比較起來，國際形式還不如民族形式容易得到歡迎。這是因為漢字已經沿用很久，人們對它發生深厚的民族感情，新的文字在形式上如果和它有一些聯系，人們就感到這是自己的東西。因此我們目前對於漢字拼音字母的採用，就必須集中在最能切合現實的一定的範圍，就是根據漢字形式創造的，和漢字有一定聯系的這些字母的範圍。

在這個範圍裏面，可能產生的拼音方案又有兩類，一類是因襲漢字的形聲字形式，每個音節除拼音字母外還加上意符（形旁）來區別同音字；另一類是純粹拼音，不加意符的。加意符的一類，不是根據現代漢語來創造新文字，而是根據字典裏的漢字來改頭換面，它可引以自豪的是：古代的作品都可以照古代語言用新文字寫出來；但是用來寫現代語，就可能是個笨拙的工具。不加意符的一類，是根據現代漢語拼寫，採用詞兒連寫，並且附加必要的聲調符號，或再用一些適當定形化的方法來分別同音詞的。就拼音方法說，這些方案中有的採音素分析制，某些音節得用四個字母拼成，又叫做四拼制；另一些是對複合韻母的音素不分析或不完全分析的，就是三拼制（如現在通行的注音字母）和雙拼制，雙拼制得用五六十個字母，但是音節簡短，比較最接近漢字。在一定意圖之下，許多方案的字母形式，不約而同地採取了一些筆畫簡單的漢字（如乃、几、巾、丁、乙、士、七、止、五、弓、片、木等）或漢字偏旁（如糸、彳、冫、亠、牛、子等），也有採用草書的。此外還有因為分聲調而將韻母（或聲母）造成幾種不同形式而使字母增加到百多個的。有基本上採四拼而將字母上下疊合充作雙拼的。

以上簡單的介紹，說明我們的字母研究已經接近成熟，只要把大家研究的成果綜合起來，加以提煉，就可以應用，用不着再費多大力氣去個別地鑽研了。可是漢字改革問題是複雜的，字母問題以外還有詞兒連寫問題，詞兒定形化問題，基本詞彙和常用詞彙的搜集和選定問題，語法問題等等，都需要作深入而切實的研究。如何溝通各地方言和普通話，使得（轉 22 頁）





## 一些簡單的意見

葉聖陶

希望寫廣播稿新聞稿的，寫完之後好好兒唸一遍。唸的時候不一定要高聲，也可以不出聲，作用是一樣的，總之是憑自己的口唸一遍，同時憑自己的耳聽。不出聲也可以聽，因為默唸的是自己，在內裏可以引起聽的感覺。

廣播稿完全是讓人家聽的。新聞稿印在報上，固然是讓人家看的，可是各處地方都有讀報組，一個人讀報，不就有好些人聽報嗎？所以這兒的“新聞”應該取它最廣泛的意義，連社論、專論、通訊之類都包括在內，凡是印在報上的，不但讓人家看，同時也是讓人家聽的。

寫稿的自己好好兒唸一遍，就是自己先來檢驗一下，寫下來的那些語言上不上口，順不順耳。也可以說，就是自己站在旁人的地位，把自己的語言唸一唸，聽一聽。要是不怎麼上口，不怎麼順耳，必然是語言有毛病，就得修改。人家了解咱們的意思單憑語言，語言有毛病，怎麼可以不修改？人家要唸咱們的語言、聽咱們的語言的，語言有毛病，怎麼可以不修改？修改成什麼樣兒才了事呢？到自己滿意，認為上口順耳為止。

這兒必須說明，修改語言同時是修改意思。原來用的“但是”，修改之後去掉“但是”，意思就跟原來不一樣了。原來用的“責罰”，修改之後成為“懲罰”，意思就有些出入，因為名副其實的兩個同義詞根本不太多。原來說的“我昨天上天津去”，修改之後成為“昨天我上天津去”，意思好像一樣，語氣可不同了——語氣也是意思的成分。僅僅修改語言的事兒是少有的，修改語言往往連帶修改意思。

語言不上口不順耳，什麼不好呢？簡單的回答，那是說得不好。仔細的想一想，說得不好不就是意思不大對勁嗎？不就是沒有挑中切當的語言把意思說出來嗎？不就是咱們跟人家之間，在意思的傳達上還隔着一層嗎？語言改得切當了，又上口又順耳了，同時意思就對勁了，在意思的傳達上就一絲兒也不隔了，這才符合咱們的意願。

必須這樣了解，才知道修改語言不是枝節的事兒，不是純技術的事兒。

唸下去覺得嚕里嚕囀，意思必然不清不楚，不明不白。那大概得下手刪除，好像整理荒廢的花園似的，去掉那些亂枝雜草，就可以像個樣兒。

唸下去覺得連不上氣，意思必然有不怎麼貫通的地方。那大概得重新想，重新說，或者換幾個語詞，或者調一些句式，或者顛倒一下語句的次序。重新說得唸下去順溜了，意思就像溪溝裏的活水似的流通了。

最好盡量用通行的說法。通行的說法是大多數人用來傳達意思的，是大多數人說慣聽慣了的，咱們拿來用，就一絲兒不隔，語言出在咱們的口裏心裏，意思透進人家的耳裏心裏。比較不太通行的說法，繞一些彎子的說法就不然，即使意思沒有錯兒，人家總覺得有些兒生分、不自然，這多少就是隔。譬如說“我們對於貪污浪費必須予以反對”，“我們對於某某要進行說服工作”，人家一聽，稍稍一愣，跟着就想，原來就是“我們必須反對貪污浪費”，“我們要說服某某”，為什麼說得那麼彎曲呢？在這一愣一想之間，人家一口氣聽下去的勁兒就打斷了。

廣播的聽衆，新聞的讀者已經提出要求，要咱們盡量用通行的說法。要是咱們只管自己，不顧旁人，那當然不用考慮什麼。要是咱們明白那不是自己一面的事兒，還得顧到旁人，就該隨時調整咱們的語言，運用大多數人傳達意思的方式。咱們必須分別清楚，用比較不太通行的說法，繞一些彎子的說法並不等於語言的提高，盡量用通行的說法可能夠擴大咱們意思的普及。就不說什麼爲人民服務吧，單爲咱們意思的普及打算，咱們也得順着這條路子走。

切不要用一些怪模怪樣的詞語，如“但却”之類。就時代說，古今全不用，就地區說，咱們中國東南西北沒有一處用，是語言裏頭生造的東西，是意思裏頭不合用的成分，那樣的詞語只能說它怪模怪樣。生造語詞不能跟語言的發展混爲一談。語言的發展全憑實際的需要，合乎民族語言的規律，生造語詞好比私印鈔票，要拿到市場上去流通。假鈔票不起交換的作用，生造的詞語雖然不像假鈔票那樣不值錢，傳達意思總得大大的打個折扣。



★

★

上口順耳的稿子就是意思明白通順的稿子，人家不必花費無謂的力氣就可以了解，而且決不至於發生誤會。在這個基礎上，人家可以贊同稿子裏的意思，也可以不贊同——反對或是駁斥稿子裏的意思。咱們不是有那樣的經驗嗎？聽了一番不怎麼明白通順的話，心裏只覺得糊塗，簡直說不上贊同還是反對。

上口順耳的稿子可不一定就是意思有價值、對人家有益處的稿子。聽衆們讀者們還有要求呢。他們的要求歸結成一句話，希望不要來那麼老一套。這一句話很簡單，意思可不簡單。這不就是說他們對於老一套有點兒不耐煩了嗎？這不就是說他們希望聽一些讀一些所謂言之有物的東西嗎？這不就是說他們振振有詞的提出了他們的需要嗎？要是咱們顧到聽衆們讀者們的利益的話，做到了上口順耳還不能就此滿足（這兒再一句，上口順耳是起碼的條件，非做到不可），必須在上口順耳之外，給人家一些有價值的、有益處的東西。

老一套，用咱們的話說，就是概念化、公式化。聽衆們讀者們不要老一套，就是不要概念化、公式化。

成段成篇的舉例未免麻煩，不妨拿片言隻語來談談。譬如說“某某做工作一貫積極”，“會議始終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就語言說，又上口，又順耳，就意思說，也確然成個意思。可是前後如果再沒有照應補充的話，

那就不能叫人家滿意。人家要知道的是怎麼樣一貫積極，你可只告訴人家個一貫積極。人家要知道的是怎麼樣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你可只告訴人家個始終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哪一個積極分子都可以說他一貫積極。哪一個和諧的會議都可以說它始終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所以那樣說法實在沒有告訴人家某一個積極分子和某一次會議。

概念化、公式化的情形就是這麼樣：好像告訴了人家一些東西，可是人家仔細辨一下，並沒有得到什麼東西。

去年文藝界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提出了必須克服文藝方面概念化、公式化的傾向。廣播界、新聞界似乎沒有提，可是也應該提。在宣傳教育的意義上，廣播、新聞不是跟文藝有共通之點嗎？何況聽衆們讀者們已經表示了意見，希望不要來那麼老一套。

或許有人要說，那不是語言問題，是內容問題了。

我就是最不服把語言跟內容分開來說的一個人。咱們不能拋開了意思談語言，也就是不能不管內容專談語言。咱們既然要談廣播和新聞的語言，我就提出寫在這篇裏的一些簡單的意見，一要求其上口順耳，二要求其不概念化、不公式化。

## 參考書

馬克思及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全集，卷四。

恩格斯：《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的過程中的作用》。單行本及全集，卷十四。

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單行本及全集，卷十六。

列寧：《論辯證法問題》。全集，第三版，卷十三。

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全集，卷二十。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全集，卷二。

斯大林：《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全集，卷三。

斯大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全集，卷一。

斯大林：《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第三部分。全集，卷十二。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一九五〇。

## 二

《在斯大林著作底光輝下的語言學問題》論文集。國立莫斯科大學出版，第一版，一九五〇；第二版，一九五一。

## 三

（個別部分的事實資料可以批判地利用：）

保爾惹津斯基 B. K.：《語言學引論》。第四版，莫斯科，一九四六。

托姆孫 A. И.：《普通語言學》。第二版，奧得薩，一九一〇。

保高洛底次基 B. A.：《普通語言學講義》。第二版，喀山，一九一五年。

保高洛底次基 B. A.：《語言學及俄國語言綱要》。第四版，莫斯科，一九三九。

烏沙可夫 Д. И.：《語言科學簡論》。第九版，一九二九。

彼得孫 M. И.：《語言學引論》。國立莫斯科大學第二部教育學系函授學校辦公處，莫斯科，一九二九。



# 新聞語言必須接近民衆

鄭之東

## 1 問題是從哪裏來的？

新聞用什麼樣的話來寫，這在今天看起來好像是不成問題了。你看，全國性的大報紙，地方性的工農大眾報紙，不都是用白話文寫消息和評論嗎？新華通訊社天天發出來的電訊，不也是用白話寫的嗎？白話，就是民衆的語言，幹嘛還要提出新聞語言接近民衆的問題呢？

可是，我請問你：報紙、電訊全部採用白話，有幾年的歷史？嚴格地檢查一下，今天的報紙、電訊……是不是全部採用了白話？進一步問一聲，今天的報紙、電訊所使用的白話，是不是真正的白話，唸出來民衆到底聽得懂聽不懂？仔細想一想，這裏頭又似乎並不是沒有問題。

報紙、電訊全部採用白話，在老解放區不過十年左右；在全中國，那是解放以後的事情，只有三年多一點。以前呢？封建主義時代的“邸抄”“京報”全部是文言，且不去說它。從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有中國人自己辦的現代報紙起①，到1949年全國大陸解放止，七十六年中間，報紙、電訊可以說得上是文言文和半文言文的一統天下，或者也可以說是文言文的久攻不破的最後一個強大堡壘。是誰打垮了文言文的這一個最後的強大堡壘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文化革命運動，是毛主席所領導並隨時關懷着的《紅色中華報》《新中華報》《新華日報》、新華通訊社、《解放日報》《人民日報》等大大小小的革命的新聞部隊。

過去有過白話的報紙沒有呢？有過，例如《中國官音白話報》《蘇州白話報》《京話報》等②。可是他們不佔統治地位，在反動勢力統治下，多數是隨生隨滅。許多全國性的壽命很長的報紙，全都是用文言。至於通訊社，因為它根本不考慮民衆看得懂看不懂的問題，打電報又圖省錢，搶時間，所以更是專用文言，不用白話。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白話文雖然打進了報紙的副頁，（例如有名的北京《晨報副刊》，曾發表過魯迅的白話小說。）然而主要的消息、評論和廣告等，仍然是文言文在坐“朝廷”。這種文言，自然也淺顯化了；夾雜了新名詞和若干歐化句法。從梁啟超以來，形成了一種所謂“報章體”的東西。但是文言總是文言，它的字眼是文言字眼；它的句子結構方法和腔調，都是文言

的。1923年，有個叫做“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團體曾寫信給全國各主要報紙，請改用語體文，然而沒有人理他，什麼結果也沒有。由於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封建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鼓吹保守主義和復古主義，在國民黨統治的年代裏，報紙、電訊等的語言簡直混亂得可怕。瞿秋白同志在《亂彈》裏曾經搜集了報章上的各式文章，加上按語，陳列展覽。他又曾把《申報》比作“天天在開中國語言的‘古物陳列館’”。就新聞語言來說，真可以說是無奇不有。在這裏面頂佔優勢的是瞿秋白同志所說的“現代文言”。他描寫這種文言說：“……用古代文言做根據，竭力的對白話讓步，同時，把西洋東洋運來的一切種種新術語放進中國的文言裏面去。這樣便造成了現代文言”。又說：“他是只能够看不能够讀的東西。”正是這一類的東西，統治了新聞版面六七十年。

1931年以後，又有過一次要求把白話寫得更純潔更健康的運動（所謂“大眾語運動”）。這個運動進行得很熱烈，也曾把新聞上的陳腔濫調，當作主要攻擊的對象。但是報紙仍然沒有因此廢掉文言和半文不白的文體來改用白話。只有上海一張小報《立報》，在進步的知識分子支持下曾作過一些用白話寫新聞的實驗，可是並沒有能够堅持下去。

在反動軍閥和國民黨統治的時期裏，也曾出現過幾份白話通俗報紙，但是他們的目的在於欺騙和麻醉羣衆，並沒有根本改革新聞語言和體裁的意思，自然也就沒有什麼影響。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裏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創刊。在開始的時候，它的社論和新聞，受環境的限制，仍然不能不用淺顯的文言。後來很快地把社論和通訊改成白話，可是主要消息，因為受國民黨通訊社的控制，仍舊不能完全運用白話。1943年《新華日報》在重慶又曾嘗試把當時通訊社所發的文言電訊改造成白話。它自己直接從外國通訊社翻譯出來的電訊和評論，更全部是用白話。整個說起來，在《新華日報》的版面上，白話文差不多已經佔到四分之三的地盤。但是因為新聞電稿不能不採取別人用文言寫成的東西，篇篇改寫不可能，就算是改出來也不能成為流暢的白話；所以還不可能成為全部用白話寫新聞的報紙。



全部採用白話的報紙，是在人民民主政權底下出現的。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民主政府在瑞金出版了《紅色中華報》。這是共產黨和人民政權辦給人民看的報紙，這就決定了它非用白話不可。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這張報紙到不了全國各地，它的影響自然還限制在當時的蘇區以內。但是，用人民的語言寫新聞，辦報紙的傳統，却一直傳下去。到抗日戰爭時期，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出版的報紙（像《新中華報》、《新華日報》太行版等），基本上都是採用白話的。

1941年中共中央的機關報《解放日報》在延安出版，這才有了第一張有全國政治意義的、基本上是採用白話的大型報紙。這個報紙的正確明白而又生動有力的白話社論，傳播到全國各地，在文風上也正如同在政治上一樣，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在電訊方面，1934年在蘇區成立了“紅色中華社”，到1937年改為“新華社”。1941年它從報紙分出來，正式成立“新華通訊社”，向全國廣播新聞稿。在中國這才有了第一個有意識地採用白話寫新聞的通訊社。自然，在初創時期，這樣的報紙和電訊還不可能完全擺脫文言長期統治造成的影響。許多篇新聞所用的白話還殘留着相當濃厚的文言，不是接近民衆口語的純粹白話，甚至於還難免夾雜着一些黨八股。然而經過整風運動，特別是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解放區以內的報紙，電訊上的新聞語言，有了很大的改進。1943年以後，《解放日報》先後發表了《清新聞工作中的黨八股殘餘》、《報紙與新的文風》等社論，反對新聞中的空洞無物的八股，要求新聞要用質樸素的文體來寫。這對於新聞語言的更加接近羣衆，有很有力的推動作用。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重慶《新華日報》上的新聞，主要是採用新華社供給的白話通訊稿和自己從全國通訊社的電訊稿直接翻譯過來的白話譯文。文言文已經成為殘餘。可是在國民黨方面呢？因為它在政治上壓迫人民，脫離羣衆的，雖然個別報紙、通訊稿着要改用白話寫新聞、發消息了，然而事實上不少吵罷了，並沒有什麼可以看到的結果。直到解放前，國民黨統治區的報紙、新聞，絕大部分仍然是文和半文言的天下。至於詞彙的夾雜、混亂，語法的錯不通，更是說也說不完。

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裏，新華社每天廣播白話新聞，有很大的戰鬥力量。正因為它用的是生動活潑的白話，就更顯得理直氣壯，堅強有力。

人民的報紙跟隨着勝利的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地站起來，封建地主階級和買辦、官僚資產階級的代言

機構倒閉了或者逃跑了。存下來的一些歷史較久的報紙，也竭力改造自己來適應人民的需要。新華社的白話電訊成了各報新聞的主要來源。這就從根本上摧毀了盤踞在新聞界中六七十年的文言文的統治地位，白話的新聞成了佔統治地位的巨大力量，用人民的語言寫新聞的願望基本上實現了。這在中國新聞事業的歷史上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

然而這並不是說在新聞語言上就沒有問題了。正因為人民取得了政權，羣衆熱情地關心政治；愛讀報紙，愛聽讀報的人增多了。這就從實際生活中考驗了咱們的新聞語言是不是真正接近了民衆。羣衆是迫切要求更好懂的報紙和電訊的。比如1951年五、六月間，新華通訊社總社曾經經過各地分社徵求讀者對於新聞電訊的意見。當時關於語言問題的主要反映就是：稿子很不通俗，有的夾雜文言，很難看懂；國際新聞電訊的句子長而且生硬，太洋化，很費解，看不懂的人更多。總的要求是新聞要寫得口語化，大衆化，更加通俗好懂一些。在報紙方面，1951年夏季，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指導下面，也曾提出報紙應當儘力作到通俗化的號召。許多地方報紙，首先響應，努力把報紙改變得更加通俗好懂，以廣大的區村幹部和工農羣衆為對象。比如湖南的《大衆報》，就是因為辦得通俗而受到表揚的一個。

爲了消滅新聞中的事實錯誤和語文錯誤，新華通訊社總社編輯部在1951年二月曾經展開了一個“練筆運動”，提倡核對事實，學習語法，研究標點符號使用法，力求文字通俗，要克服任意使用文言、不必要的歐化和句子冗長等毛病。1951年九月，新華通訊社更建立了地方新聞編輯部，每天廣播口語化的新聞七千字，專門給那些把工農、市民作為對象的地方通俗小報採用。這一部分新聞電訊是特別注意語言接近民衆的問題的。

1951年六月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重要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爲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同一天開始刊載呂叔湘、朱德熙合寫的《語法修辭講話》。這篇社論指出：正確地運用語言來表達思想，在共產黨所領導的各項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因此必須使任何文件、報告、報紙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確的語言來表現思想，使思想爲羣衆所正確地掌握，才能產生正確的物質力量。”

一年過去了，我們的報紙、通訊社是不是完成了《人民日報》那篇社論所正確地指出的這一個任務呢？如果有些地方完成了，他有什麼好的經驗？如果還完成得不好，有什麼原因，有什麼困難？必須指出：近兩年



來，新聞工作者對於新聞語言的改進，是相當努力的。很多編輯、記者同志們，拚命學習語法，學習人民的語言。一般地說來，在電訊中，在報面上，過分突出的文言、歐化、冗長的語句是少一些了；語法錯誤也相對地減少。可是，是不是說新聞語言問題就不存在了呢？不，不僅存在，而且還是相當嚴重的。嚴重在什麼地方呢？主要是沒有認真作到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講的“言語必須接近民衆”；沒有很好地完成使祖國語言更加健康和純潔的任務。這從消極方面看，不必要的文言、歐化詞句仍然天天和讀者見面。隨便拿一張報紙檢查一下，就可以找出一堆語法、修辭錯誤一再重複；讀報組、廣播電台直接拿新聞來讀，很多讀者還是不懂；好些障礙不出在內容上，倒是出在語文上。從積極方面來看，充分運用了民衆語言、寫得生動活潑、爲人民所樂讀喜聽的通訊、新聞、評論，雖說出現了一些，可是數量還嫌太少。我們迫切地希望新聞工作者不光善於運用祖國的語言，而且努力使它更加純潔，更加健康，更加豐富和完美。追敘一下新聞語言的歷史，知道這個問題是從哪裏來的，掌握住新聞語言的發展規律，我們對於改進新聞語言，使它更加接近民衆，將會格外地有信心，有勇氣。

## 2 新聞語言上的幾個實際問題

要新聞語言更加接近民衆，空喊是沒有用的，這裏面有些實際的問題需要加以解決。

首先是對於新聞語言大衆化的看法問題。目前在新聞工作者中，有一種這樣的看法：普及和提高應該分開。口語化、大衆化是通俗小報的事情；至於全國性的報紙和電訊，主要是辦給文化水平較高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們看的，嚴格要求口語化、大衆化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正由於有着這種看法，再加上文言新聞套語長期的影響，我們許多全國性的大報，才能够不加選擇地用文言寫標題、發消息，毫不在意是否會脫離羣衆。情形甚至於到了這般地步：批評儘管他批評，文言還是照舊用。你在昨天批評說民衆語言裏既然有“到了”何必還用“抵”或“抵達”；我在今天的版面上偏偏用上兩三處“抵”和“抵達”而不用一個“到了”。你寫一本《語法修辭講話》，講得頭頭是道；我在詞彙、語法上仍然任他含混錯誤，沒有從根本上考慮如何改正。呂叔湘先生在中國語文社召開的新聞語言問題座談會上只講了一句話：“在今天的報紙上，還和一年以前一樣容易找到有語法修辭錯誤的例句。”這樣看起來，如果不從對於新聞語言的根本認識上首先求得一致，脫離民衆的錯誤仍然會繼續重複下去，問題是沒法得到

解決的。蘇聯新聞工作者布朗特曼說：“要想出一種度自然而然地保證報紙避免不準確和錯誤，當然是可能的。全部問題就在於文字工作者的內心的動機跟對於交給新聞記者的事業的黨性的責任感。”他指的是事實的錯誤；然而對於語文的錯誤，這話也是同樣適用的。如果新聞記者和編輯同志們不認識到在版面上、電訊中必須毫無例外地認真作到語言接近民衆，新聞語言是沒法真正作到口語化和大衆化的。如果通訊員、記者寫的稿子本來是好的白話，可是拿到負責編輯那裏却被改成更像新聞套語樣子的文言，那事情就只好辦了。

我們認爲全國性的大報和電訊跟地方性的小報、電訊，內容儘管有深淺、詳略的分別，語言可只應當有一種，而不應當有兩種。誰要是認爲在知識分子中可以有一種字面上能够看懂、可是知識分子嘴裏也說，同時也未必能聽懂的新聞語言，專替自己服務；結果必定會引導出一種脫離羣衆的文章體裁，最後走向文言的危險。實際上知識分子並不可能在全民語言以外另造一套語彙和語法。在語言上只有豐富精密的程度上的差別，沒有普及和提高的分別。知識分子間的某種同行話，不可能是比普通人民的語言高一級的語言。請問：“函覆”比“回信”，“此間”比“這裏”，“致電”比“打電報”，“訊”比“消息”，“獲”比“得”，……到底在什麼地方“提高”了一些呢？一點也沒有。不過是文言的新聞套語的正統觀念在搗鬼罷了。著名新聞記者愛倫堡告訴我國的新聞工作者說：“我們生在那一個國家裏，都應該和所謂‘磨光了的銅元’比‘作鬥爭’<sup>①</sup>；可是在我們的新聞語言裏，問題却不是反對使用磨光了的銅元；我們還必須一再提出‘要攙用不通用了的小制錢！’用制錢不用人民幣，用生氣的文言詞句不用活生生的語言，你說，這恐怕很難叫做‘提高’的吧！”

我們提出新聞語言問題來，主要地不是要求通俗小報或者地方廣播新聞的語言更加接近羣衆，——在這方面，他們是十分努力的，而這種努力很有價值的。——我們迫切希望的是：全國各個響的大報紙和作爲每天新聞主要來源的新華社電訊，要更徹底地肅清陳腔舊套，大胆地使用人民的活潑的語言。對於我們民族語言的發展有直接的，正是這些報紙、電訊的語言。口語化、大衆化，祖國語言的更加純潔和健康而鬥爭，最好是先從性的報紙、電訊上做起。

第二，那麼我們是不是要完全拋棄或者消滅語言中的文言成分呢？不，在上面的一段話裏，並



這個意思。而且要那樣作也是絕對作不到的。我們所反對的只是不必要的文言成分，換句話說，就是在現代活的語言裏本來有更好的詞彙和說法可用，根本用不着了的那些文言成分。至於有價值的、必需的文言成分呢，那正像毛主席所說：“古人的語言寶庫還可以掘發，只要是還有生氣的東西我們就應該吸收，用以豐富我們的文章、演說和講話。”

具體說來，哪些文言成分是應當保存下來，哪些又應當堅決廢掉呢？這自然是沒法用什麼條例規定下來的。可是文言、白話間的大體的界限總應該清楚地劃一劃。白話跟文言在詞彙和語法上都是有差別的。關係到這兩方面的是表示語法關係的虛字眼。在我們的報紙上，天天可以找到文言虛字眼的濫用。有“和”偏要用“與”，有“跟”偏要用“及”，有“在”偏要用“於”，有“已經”偏要用“已”，有“罷了”偏要用“而已”。有“越來越完備”偏要說“日臻完備”。如果是經過精心考慮認為不能不用，有些文言虛字還是可以保留的。比如“而”字，有時就很難避開不用。可是我們所看到的文言虛字眼濫用，多半只是因循老一套，或者是爲了標題上省掉一兩個字，並不是經過慎重考慮以後才應用的。那就不能不認爲是“不加選擇地濫用文言”，是對現代白話的純潔和健康有害的了。許多一眼看得出來的文言詞彙常常在報紙上出現，例如：潮於、續殲、蒞會、擊退、不齒、……。文言的句法，有時候顯得挺簡練，可是毛病是往往含混不清。比如這樣一個標題：“我抗議美機兩度侵入會場區”，字數是精簡到無可再精簡了。然而，“我”是誰？是“我們中國”呢，還是“我們朝、中方面”呢？把“我們朝、中方面”六個字縮簡成“我方”兩個字，本來已經够了；可是偏偏要縮成一個“我”字。不懂文言文法的老百姓聽了一定會問，“你一個人幹嘛要抗議這麼一件大事呢？”此外，把“美國飛機”省成“美機”，把“兩次”說成“兩度”，都是文言老套的陰魂未散。如果一位蘇聯的記者用古斯拉夫語的造句法寫出一條標題登在《消息報》上，一定會引起蘇聯勞動人民的嚴重抗議。可是在咱們新中國，用古代語法和文言詞彙寫標題，寫新聞，却是天天會碰見的怪事，以至於人們已經見怪不怪或者不敢說怪了。還有，毛主席說：“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古典。”一般說來，這種古典在報紙上已經很少出現了，可是還不能說是已經絕跡。我們在報上還是可以找到“沆瀣一氣”“發飲鳩嗜血的財”“震駭莫名”一類的“廢話”——早該作廢了的話。省略或簡稱，有時候是免不了要用的。可是在我們的報紙上，有一些省略還是在重複着把任何兩個字以上的成語都加以省略的老毛病，

不一定是由於真正的需要。比如“斯大林國際和平獎金得獎人簡介”，就是不必要的省略。說“簡單介紹”，誰都能懂；說“簡介”可就非得加解釋不可了。上面說的這些類不必要的文言成分和省略，都應當從我們的語言中清除出去。“我們要說現在的、自己的話，用活着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情感直白地說出來”（魯迅）。

第三個問題是怎樣來說明複雜的事理而又不使句子過於冗長。長到令人難懂的歐化句子，常常是在翻譯文字裏出現的。比如有這末一句譯文，是說明艾奇遜在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的一次演說的。一個謂語用了六十六個字：“透露了美國統治集團對於世界輿論不再相信美國宣傳的謊話而且愈來愈堅決地譴責美國干涉朝鮮並要求結束朝鮮戰爭這些事實所感到的焦急不安的心情。”這種句子構造法，就是讓學過外國文的知識分子看來也會覺得吃力的吧。是不是非這樣不足以忠實地傳達原文的意思呢？如果真是非常必要，增加一些雖說不大習慣可是確實是精密準確的句子結構方式，我們是不應當反對的。可是像上面的情形，大概只是譯者在倉卒之間沒有想到中國話裏有更好的說法罷了。他沒注意到，像“心情”前面這樣複雜的說明語，在漢語裏常常是把他擺在後面的。中國話裏決不是沒有構造複雜的長句子的。可是它的字眼次序安排得叫中國人聽了能懂，看起來舒服，大家就不覺得他長了。語法上的精密，我們是需要的；組織得好的長句子，我們也不怕他長。可是，一句譯文，他既然不再是外國話而是中國話了，總得要儘可能地適合中國人說話和聽話的習慣。這意思就是說，翻譯來的新聞，也得竭力接近民衆的語言。這件工作挺困難，可並不是絕對辦不到。我們看蘇聯電影裏的漢語對白，不是漸漸能作到讓人聽起來容易懂而且受到感動了嗎？可見新聞翻譯工作者一定要努力作到把外國話變成中國話，而不要滿足於把外國話變成中國文。要相信活的漢語在說明複雜事理上並不比其他民族的語言更差勁。不過我們必須好好向民衆學習，在精通了民衆語言以後才能正確地運用它。

第四個問題是用字和譯音的問題。名記者戈公振在二十多年以前就曾經表示了一個願望：“吾意報紙當此過渡時期，紀事之文，宜力求淺顯，勿引古典，勿用冷僻之字，字數如能做照日本報紙辦法，減少至二千八百枚則尤佳。必使具小學畢業以上程度者，即有讀報之機會。”<sup>①</sup>這個願望能不能實現呢？依我看，也不能也能。如果中國的文字原封不動，記者、編輯、作家對於漢字的使用不加思索，任意採用“冷僻之字”甚至於自造新字，那就不光只“減至二千八百枚”作不到，連現



有字架上的六七千字也不够用。各報館不都請的有刻字工人，天天在那裏刻字嗎？然而如果新聞工作者能贊助文字改革的事業，並且有勇氣提倡實行，那麼不光只“減至二千八百枚”可以作到，連把漢字限制在兩千字以下也並不是作不到的。現在的日本報紙書刊，已經不再用二千八百漢字了，他們現在只用一千八百五十個漢字。怎麼能夠作到這一點呢？因為他們有一套“假名”字母，拿來直接寫話，許多繁難冷僻的漢字，就可以不用了。我們現在還沒有造好拼音文字的字母，可是我們有一套現成的東西——注音字母。速成識字法大力推行以來，認得它的人，大大地增加了。完全用這套字母作為文字，還有困難。然而首先拿它來代替一部分根本不需要講究形義的漢字，却是可以立即實行的。首先應該用注音字母來代替漢字的是譯音。現在新聞上譯音的混亂和困難，簡直可以說是無以復加。每一個譯名，都要用漢字來定型。“亞歷山大羅夫”不許寫成“亞力山大羅夫”，“米哈伊洛夫”不許錯成“米哈依洛夫”。這比起“柴霍甫=齊鶴夫=契訶夫”來，自然要稍微好一點。可是有兩筆的“力”不用，偏要用十六筆的“歷”，道理在哪兒呢？再進一步說，有現成的更便利於譯音的注音字母不用，偏要在用這個漢字，那個漢字上大費精神，到底是為什麼呢？一定要讓 Гоголь (果戈里) 姓“郭”，Тургенев (屠介涅夫) 姓“屠”，魯迅在三十年前已經大聲反對了。可是我們今天翻譯外交使節的姓名，却還非要查百家姓不可！如果譯音一律採用注音字母，只要起草好跟各國字母對照的規則，任何人都可以譯得不錯，根本用不着死記什麼定型漢字譯法，更用不着考慮某個譯名的字面帶不帶敬意或者惡意。如果怕不認得注音字母的人看不懂，在報紙上天天附上一張字母表；或者在譯名第一次出現的時候註上漢字的對照，也就得了。在研究常用字的時候，我們發現有很多非常用字還能在報紙、雜誌文章中出現，主要是因為他在譯音中保存着，比如“爾、伊、伽……”。如果譯音採用注音字母，可以節省掉很大一批漢字。為了真正作到統一譯名，減少漢字應用的數目，音譯是否可以一律採用注音字母？希望作新聞工作的同志們能認真考慮一下。

### 3 對於改進新聞語言的總的希望

總起來說，我們對於新聞語言的改進，到底有些什麼具體的要求和建議呢？

我們的要求是：1. 新聞工作者要盡力擺脫用漢字寫文言半文言新聞的舊傳統，繼續完成用現代中國人民的活的語言寫新聞的革命事業；不光只要保持祖國

的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且要有意識地學習並且運用民衆的語言，把新聞寫得通俗好懂，生動活潑，使得祖國語言的優點，能很光輝地發揮出來。

2. 新聞語言，經過革命的和進步的新聞工作者的多年努力，基本上已經採用了白話。現在的問題不是要放棄這種全國通行的白話，退回到一種方言（例如北京土話）去；而是要把白話寫得更純潔、更健康，更和民衆語言接近。在這種要求底下，必須拋棄陳舊的新聞套語，清除不必要的文言字眼，限制不考慮祖國語法習慣的歐化冗長句子，反對濫用省略和簡稱，少用冷僻的漢字。

3. 爲了掌握住中國語言、文字發展的法則，弄清楚怎樣才算是健康的、純潔的語言，我們的新聞工作者需要更努力地繼續向羣衆學習語言。從羣衆學習最基本的、最有普遍性的詞兒來豐富自己的語彙。從羣衆學習巧妙地組織句子的本領，學他們精確地表示複雜的意思、委婉地傳達深切的感情的方法。大膽地把羣衆的生動活潑的語言運用到新聞寫作裏來。儘可能作到不要經過文翻白的過程，不要多加講解，在廣播或者讀報的時候，唸出來羣衆就能聽懂。

毛主席曾經指示我們“言語必須接近民衆，須知民衆就是革命文化無限豐富的源泉”。新聞工作是每天向羣衆做宣傳、解釋工作的，大家來努力實現這個光榮任務吧！

- ① 最早的中國人自辦的報紙《昭文新報》1873年在漢口出版。後一年又有《匯報》《循環日報》分別在上海、香港出版。
- ② 《中國官音白話報》原來叫做《無錫白話報》，1898年出版。
- ③ 1947年八月上海《大公報》曾經聲明過要改用白話寫新聞。國民黨反動派的“中央社”在逃出中國大陸以前，也曾叫了一陣，但是它所發的白話電訊，骨子裏仍是文言。
- ④ 1949年二月新華社曾經發表了一篇《蔣介石、李宗仁優劣論》，這是一篇很有力的白話新聞文章。當時李宗仁通過中央社發了一篇題目是《致電毛澤東》的臭文言電報。新華社的評論不用很多話來罵他，只在篇尾上把一段臭文言電文，按照他的真實意思用白話譯了出來，就活活畫出了戰犯李宗仁的本來面目是多麼又可憐又可笑。
- ⑤ 伊利亞·愛倫堡1951年九月二十日《在中國記者座談會上的談話》，見同月《人民日報》。“哥比”是蘇聯的錢幣，“磨光的五哥比”這裏指用得沒有光彩的陳詞濫調。
- ⑥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380頁。



# 關於新聞語言的幾個具體問題

藍 鈺

新聞工作是專門使用語言來向羣衆作宣傳的工作，語言使用得好或者不好，當然對整個新聞工作的效果有重大的影響。現在就我在通俗新聞編寫工作中所接觸到的和感覺到的，提出幾個問題，說出一些初步意見，和關心這個問題的同志們共同商討。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展開一番討論，使我們的新聞語言更乾淨一些，更健康一些。

## 一、有沒有獨立的“新聞語言”？

提到新聞工作中的語言問題，我想應該弄明白一個概念：有沒有獨立的“新聞語言”？從前有過一種特別的“報章文體”，叫做“文夾白”。說它是文言，可是用了好些白話詞兒。說它是白話，它又有着濃厚的文言腔調。這就很像是一種獨立的“新聞語言”。現在這種“報章文體”已經不多見了，但是還有不少的遺留。

現在也有人說：我是在寫新聞呀，我不是在說話。或者說：我得有一套“規格”呀（其實是公式）。意思之間，好像也有一套獨立的“新聞語言”。

如果有一種語言叫做“新聞語言”，這種“新聞語言”和一般人民使用的語言很有些不同，那麼，我們的報紙辦給誰看呢？

新聞工作中有一些業務上的術語，這是事實。這種新聞業務的術語，也和其他各行各業的術語一樣，不過是少數的個別的詞，這是不能代表語言的，更是不能代表語言的。語言是大家——各階級各行業共同使用和共同熟知的。新聞工作中的語言問題，僅僅是怎樣正確地使用語言，而不是怎樣“創造”一套“新聞語言”。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有所誤解，以爲新聞工作者的任務，不在於正確地使用人民的語言，而在於“創造”一套“新聞語言”，那就足以使我們脫離羣衆，爲新聞八股製造理論的根據。

## 二、詞彙、舊詞和新詞

在語言的領域裏，新詞和舊詞的不斷的更替推動着語言不斷地前進。有些詞已經不需要了，現在人們已把它們從頭腦中清除出去；有些詞像“蒞臨、髮指、背、變本加厲、再接再厲”等等，報紙上還偶然可以看

到，那也是脫離口語的，要不得的。

爲了使我們的文章健康起來，就得來一番大掃除，跟陳詞濫調展開鬥爭，把這些僵屍清除出去。

正確地推廣和使用新的詞，是我們新聞工作中一個經常的任務。因爲只有從新的生活中產生出來的新的詞，才能確切地反映生活。例如農民改進了耕作方法，就產生了“疏株、密植”這樣的詞。火車司機改進了駕駛技術，就產生“滿載、超軸”這樣的詞。

採用新的生動的詞，必須面向羣衆的生活和鬥爭，只有羣衆的生活和鬥爭，才是語言發展的動力。

但是，這並不是說，羣衆的一切東西都是好的，完全用不着選擇。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就變成尾巴主義者了。羣衆口中的詞，有陳舊的東西也有新生的東西，有落後的東西也有先進的東西，有消極的東西也有積極的東西。這是必須加以區別的。比如從前陝北的農民嘴巴上有時喜歡掛一句“鬼子餘(Δ x Ĩ)”。這是不好的，不應該使用的。這樣的詞是逐漸要被羣衆自己淘汰的。

我們要推廣和使用新詞，那麼，文章裏新詞一大堆，這怎麼辦呢？這豈不正是讀者大感頭痛的事嗎？

是的，現在正是存在着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在談到推廣新詞的時候，同時必須反對生吞活剝地濫用新詞、堆砌新詞，把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東西硬塞給讀者。

推廣新詞應該恰如其分，當用的用，不當用的不用。要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逐步推廣；不能一下子就什麼都攤開來，把一份計劃書上的全部新名詞都一股腦兒抄到報上去。同時還得有解釋、有說明；先說清楚什麼叫“基本建設”，然後再用“基本建設”；先說清楚什麼叫“地腳螺絲”，然後再用“地腳螺絲”。當然，這樣做起來，難免就有些麻煩。可是，如果我們要避免麻煩，讀者可就麻煩大了。據說有人把“超軸、滿載、五百公里”簡縮成“超滿五”，這讓人怎麼能懂呢？

已經這樣做了，可是，讀者還是不懂得，或者說，接受不了。這又該怎麼辦呢？羣衆由於生活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和他們生活圈子以外的許多新詞，存在着一些甚至很大的距離。只有羣衆生活不斷地變革和發展，科學知識不斷地豐富起來，這種距離才能夠逐漸縮短。例如羣衆經過一次民主建政，有了政治生活的鍛



鍊,就可以學會一大批政治的語詞。這得有一些耐心,着急是不成的。不着急,也不拖拉,埋頭苦幹地做下去,加上羣衆生活的逐漸豐富,情況就會改變的。

### 三、關於方言土語

我國地大人多,在歷史上長期分散,方言的情況是很複雜的。方言不僅和民族語言並存,並且人們經常用方言的詞來充實民族語言的詞彙。

有許多方言詞彙,只能在當地使用,到了另一個地方,那就得換成另一種說法。比如:南方叫“趕場”;北方叫“趕集”。南方叫“公馬、母馬”北方叫“兒馬、驢馬”。但也有很多方言土語的詞彙,逐漸全國化,大家都懂了。比如“二流子”,本來是陝北的土話,現在就是一個帶有全國性的詞了。

方言中有很多好的詞,應該吸收採用,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不能把方言看成是整個語言的發展道路。因為語言的發展道路是走向全民族一致的語言。方言只能在這條道路的另一方向演一個配角。

確實有過這樣的情形:在一篇文章裏堆滿了方言土語。這樣的文章不僅外地人看不懂,本地人也不一定全懂。有許多土話,本來是沒有文字的,寫文章的人模擬聲音造出字來,有時張三這樣造,李四那樣造,一人一個樣,聲音近似,面目全非。寫文章的人這樣做,原是為了通俗,結果却產生了相反的效果。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陝北人表示“懂不得”的土話,聽聲音是“害不哈”,正確的寫法是“解不下”,但有人寫“害不下”,也有人寫“解不下”。如果說“不懂得”陝北人也是懂的,那麼我們就要儘可能地少用“解不下”。其他太土的土話,也應當少採用。

不能把使用方言作為一張報紙或一篇文章是否通俗的標準;更不能認為使用方言越多,文章就越通俗。一般說來,地方報紙使用方言可以多一些,全國性的報紙或通訊社使用方言就不得不少一些,特別是要更慎重一些。總之是要使盡可能多的讀者能夠看懂聽懂。

從語言的發展方向看,方言的地盤是要逐漸縮小的,是要逐漸融匯在民族語言、統一在民族語言裏的。方言中的一切精華,都會補充到民族語言中來,使民族語言的內容更加豐富。我們需要不斷地整理和提煉我國的極其複雜的方言,同時又要採取慎重的態度,不宜生造硬用;該淘汰的還得要淘汰。我們不應該忽視對方言的提煉和使用,可是也不能濫用。

### 四、洋八股的調子要少用

我們的許多知識分子從來不研究語法,學文章的

秘訣是“看、讀、寫、作”,“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語法這門科學不夠發展。但是不管怎樣,語法總是客觀上存在的,我們的語言總是有規律的。不管說話也好,寫文章也好,總是不能胡說八道的。不通的文章,不通的句子,使人看了聽了總是要感到別扭的。怎樣把客觀存在的語法加以總結,使它條理化和系統化,構成一套權威的、完備的、周密的語法學,這有待於語言學家的努力。現在已經有些人做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也因此有了一些研究語法的風氣。這是很好的。這使人想到我們終究能夠建設起語法這門科學來。

在新聞工作中我們也應該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新聞工作者所影響的人太多了。有許多革命的新聞工作者(連我在內)不懂語法,這不足奇怪,也不是一件醜事。因為我們不可能把什麼都學會了再來革命。但我們得開始學。

大概不會有人否認我們新聞語言中還存在着語法不通的現象。應該說,這種現象還是很普遍的,有時簡直就會出現整篇乾癮不通的文章。這種文章只是一堆方塊字的偶然湊合,讓人讀起來不瞭解它的真正意義。

應該說洋八股還是有的。洋八股的特點還不僅是倒裝語法,而是整個文章的氣勢、結構、語法、詞彙,都沒有那麼一套,使人一望而知不像中國文章,倒很像是逐字逐句直譯過來的外國文。這類文章當然是讀者沒法讀的。

要在整個新聞工作範圍內都來講通俗,可能有人不以爲然。那麼,好吧,我們來講讓讀者讀懂。這應該是一個起碼的要求了。現在我們新聞工作中好像多了兩件東西,也少了兩件東西。多的是陳詞濫調和洋八股;少的是人民的語言和正確的語法。如果這個看法還不是太錯,那麼,在這兩方面下一點工夫,多了的去掉點,少了的添上點,就將使我們的工作更接近人民,這應該是沒有多少懷疑的了。

★ ★ ★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號補充勘誤表

頁	行	誤	正
16	右倒 7-8	,加“.”的表示待商	(取消)
17	左 10	餓陷談	陷談
17	左 14	災	灾
17	左 16	酹	耐
17	左倒 9	惠	惠
17	左倒 6	分用應該並存,	分用,應該並存,



# 報紙語文必須注意純潔和健康

朱伯石

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國人民“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而鬥爭”。社論中明確指出：“黨的組織和政府機關的一個文件，每一個報告，每一種報紙，每一種出版物，是為向羣衆宣傳真理，指示任務和方法而存在的。門在羣衆中影響極大，因此必須使任何文件、報告、紙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確的語言來表現思想，使思想羣衆所正確地掌握，才能產生正確的物質力量。”並了四個出現在報紙上的犯有語法錯誤和邏輯錯誤的子，來說明語言混亂現象的普遍存在。呂叔湘、朱德兩先生的《語法、修辭講話》也列舉了不少出現在報上的錯誤的句子。這樣一來，一般作者和報刊編輯同對語言的正確使用，比較重視起來。據我所知，就不少報刊編輯同志，把《語文學習》和《語法、修辭講》作為經常研讀的書刊。應當指出，這種學習精神是得鼓勵的。只有報刊編輯同志的語文知識豐富了，文水平提高了，才可以減少乃至於肅清報刊上的語錯誤。這樣做，也就是對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起推進作用。

但是由於幾千年來封建勢力和百餘年來帝國主義力的統治，中國社會除在政治經濟方面極端落後外，文方面也陷於非常混亂的局面。有些人（包括報刊編同志）認為使用語文，只是“雕蟲小技”，不予重視。當人指出這方面的錯誤時，却認為是“吹毛求疵”，“咬字”。這些同志，還沒有體會到“學習把語言用得正對於我們的思想的精確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極重要的意義”。（《人民日報》社論）這種錯誤的認如果不從政治意義方面來加以糾正，對祖國語言的潔和健康，必然是個障礙。

正因還有不少報刊編輯同志存在這種錯誤的認而且原有的語文水平也不够高，所以，目前報刊上言混亂的現象，依然普遍存在。現在把我從中南區一大行政區報紙和幾份省區報紙上隨便摘出來的錯誤子寫在下面，並且逐句加以分析：

人民政府將這些不法分子逮捕法辦，完全是罪有應得。  
這句的主語是“人民政府”，動詞是“逮捕法辦”，賓是“不法分子”。“完全是罪有應得”照道理講，應該受到人民政府逮捕法辦的“不法分子”，“罪有應得”。

但因主語是“人民政府”，這樣就變成“人民政府”是“罪有應得”了，豈不是嚴重的錯誤嗎？這個句子有兩種改正法：將上半句改為：“這些不法分子受到人民政府的逮捕法辦”。或將下半句改為：“完全符合廣大人民的要求”。

對於這種不法行為，必須徹底查究，按照實際情況，給以應得的懲處。

應給以“應得的懲處”的不是“不法行為”而是“不法分子（商人）”。“行為”無法加以“懲處”。“懲處”這個語彙是從“懲罰”“處理”“處分”演化出來的，相當生硬，不如“懲罰”“處分”現成，應改。“種”改作“些”。

堅決克服右傾思想，組織打虎高潮。

“高潮”只能“掀起”，不能“組織”。這個動賓短語犯了搭配錯誤的毛病。

誰讀了今日本報所刊載的長沙市稅務局貪污分子給國家所造成的巨大損失，誰都會髮指皆裂。

上半句的句法不完全，“損失”下面必須加上“的消息”，上面的“讀了”才有着落。第一個“所”字不必要，應刪去。“髮指皆裂”這個文言成語，相當生硬，沒有融化到活的語言裏來，不宜使用。

資產階級是社會發展歷史上最後一個剝削階級，曾在歷史上起過非常的作用。

“非常”這個語彙本身沒有獨立的顯著意義，是用來修飾形容詞的。單是說“起過非常的作用”，意義就不明確。是非常“進步”的作用呢，還是非常“反動”的作用？《共產黨宣言》中有這樣一句：“資產階級在歷史上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見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文出版局版第三十九頁）加上“革命”兩字，意義就明確了。

抗美援朝！這是朝鮮人民的意志，信心，偉力。

朝鮮人民“抗美援朝”是對的，朝鮮人民“援朝”就講不通了。“朝鮮”應改作“中國”。如果是“朝鮮人民”為主體，就必須刪去“援朝”，把“抗美援朝”改成“抵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偉力”是作者生造出來的語彙，應作“力量”或“偉大的力量”。“這”字多餘，應刪去。整句的結構也有毛病：“抗美援朝”（或“抵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中國人民”（或“朝鮮人民”）的“意志”，說得過去。是“中國人民”（或“朝鮮人民”）的“信心”、“力量”，意思還沒完整。應改作“中國人民”（或“朝鮮人民”）有信心和

力量取得最後的勝利”。

有一位同學以參加土改回家商量其母親。

我們只能說“和他的母親商量”，不能說“商量他的母親”。這句話硬套文言句式，弄得不文不白，疙疙瘩瘩。應乾脆改作“有一位同學回家和他母親商量關於參加土改的問題”，或“有一位同學準備參加土改，回家和他母親商量”。

同事們和同學們對我提出了熱情的、尖銳的、有力的、有效的批評和意見。

這個句子，一連用了四個形容詞來修飾“批評”和“意見”，但並不因此就顯得突出，反而叫人感到堆砌。在展開批評時，別人的意見就是批評，所以“意見”可以刪去。（“和”字當然也不要）“批評”或“意見”無所謂“熱情”不“熱情”，“熱情”的應該是批評人的態度。“批評”或“意見”也不能用“有效”來修飾，有沒有效，是接受批評者的反應。“有效的”應刪。全句應改作“同事們和同學們熱情地對我提出了尖銳、有力的批評”。

奸商王伯航喪心病狂地竟不顧人民的死活，生命的安全，幹着殺人見血的罪惡勾當。

不顧“人民的死活”就是不顧“生命的安全”，“生命的安全”應該刪去。用“喪心病狂”來修飾“不顧人民的死活”，不妥，應單獨成一句，刪去“地”和“竟”。

在“三反”運動中，使我受到了教育。

“使我受到了教育”的不是“在‘三反’運動中”而是“三反”運動本身。“在”、“中”兩字應刪去。如保留“在”、“中”，就要刪去“使”字。類似這種錯誤非常普遍，希望作者和編者特別留意。

資產階級想盡種種卑鄙無恥的方法，用美人計、投其所好、吃喝、手錶、金錢等，把我們國家的幹部俘虜過去。

“美人計”、“吃喝”、“手錶”、“金錢”等，都是“投其所好”的具體內容，“投其所好”並不像“手錶”、“金錢”，……是一樣具體的東西，不能並舉，應刪去。或移到“用美人計”上面，作為一個總提。

《人民日報》社論中指出這種混亂現象繼續存在的危害性：“在政治上是對於人民利益的損害，對於祖國的語言也是一種不可容忍的破壞”。解放以後，廣大人民在文化方面也翻了身，讀報小組，普遍成立了，他們如渴似飢地從各種報刊上尋求政治知識，學習寫作，如果報刊上的語言有錯誤，必然產生不良的影響。我就有過親身的經驗：學生的作文裏，常常出現“民改”（民主改革），“參予”（參加）“驅遣”（驅逐）一類生硬的語彙；出現“對……問題，有予以重視的必要”，“那些地主

階級，成年不勞動，却過着很好的享受的日子”。一類冗冗、不合邏輯的句子。我給他們改正並解釋，他們反而振振有詞：“我們看到報上也是這樣寫的呀”！

馬克思說：“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A·托爾斯泰說：“語言是思想的工具；馬馬虎虎地對待語言，就馬馬虎虎地對待思想”。高爾基指示我們：“一切語言都是由行動和勞動產生出來的，所以語言是事實的頭、肌肉，神經和皮膚。因此，要正確明白地表現人類創造事實的過程，和事實影響人類的過程，語言的明確簡單和明瞭，是絕對必要的”。可見語言一混亂，思想和事實的表達就要受嚴重的影響。希望報刊編輯同志重視這種問題。

此外，標點符號也還沒有引起一般作者和報刊編輯同志足夠的注意。他們有些人拘於傳統的錯誤看法，認為標點是“加”上去的，加與不加，加得正確或不正確，沒有什麼關係。因此有些報紙的長標題，看去就像了一條長蛇陣。一九五二年三、四月份的《長江日報》就出現過下面三條副標題：

號召繼續加強抗美援朝徹底完成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任務厲行增產節約支持中朝人民部隊給細菌戰以毀滅性打擊（正標題是“中國各民主黨派，憤怒抗議帝國主義進行細菌戰”。）

嚴正聲明香港英國政府應立即釋放被捕的我國居民責醫療受傷者並賠償被捕和受傷者的經濟損失懲治一切殺人犯（正標題是“廣東省和廣州市各人民團體集會抗議香港英國政府捕殺我國同胞”。）

在聽取了各工作小組的報告後通過了關於草擬設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草案和致聯合國書等建議並決定延長會期至十二日（正標題是“國際經濟會議舉行全體會議”。）

這三條副標題，都超過了五十個字。不但文化水平較低的讀者會感到無從斷句之苦，就是文化較高的讀者也認為太冗長。如果能加上標點，就能減除這個缺點。

呂淑湘、朱德熙兩先生的《語法、修詞講話》第一講，開頭就告訴我們：“標點符號是文字裏面的有機部分，不是外面加上去的。它跟舊式的句讀號不同，不僅僅是怕讀者讀不斷，給它指點指點的。每一個標點符號有一個獨特的作用，說它們是另一形式的虛字，也為過分。”這是對標點符號正確的理解和估價。我們應該有此新的認識，應該養成任何文章都要正確的使標點的習慣。報刊編輯同志，更要這樣做，就是一條用標點的標題，也不隨便放過，才能通過廣大發行的報刊，建立正確地運用語言的嚴肅的文風。



# 我對於新聞語言和廣播語言的一點意見

程 天 民

自從速成識字法廣泛推行以來，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已經有了相當的提高。報紙對於他們（連我們也）來說，是每日必不可少的東西。它上面所載的各種政府的政策、法令、公告和重要消息，對於每一個人都有密切的關係。至於各種通訊報道，都能在人民生活中起一定的教育作用，這是不必多說的。

目前，讀報組已經普遍地建立和發展，那麼報紙無不成了每個讀報組的廣播稿子。僅就這一點來說，新聞語言和廣播語言就成了一回事了。最近我在報紙發現有下面幾個問題，提出來供大家討論研究。

第一：有些縮寫的詞是容易造成混亂的。如“……因遭水，旱災害減產四成至七成”<sup>①</sup>。“……等專區均增產一成到一成五”<sup>②</sup>。“有四十八個縣的牌價，基本上取平”<sup>③</sup>。像這三句中的“減產”“均增產”和“取平”都是縮寫詞，自己看倒沒有什麼，但是讀起來和別人聽，尤其是讀給勞動人民聽，就有問題了。別人感覺別扭，聽的人也感覺不順耳。況且第一句的“減產”，把意思都弄得含糊了。不知道是“產量減了四成至七成”，或者是“產量減少只收了四成至六成”。以我推測作者的意思大概是前一個。第二句寫“……一般產量都增加了一成到一成五”多麼好。第三句的作者只爲了少寫兩個字，如果寫成“取得平衡”多麼明顯爽快。

此外，“生產合作社”不要寫成“生產社”。“英雄模範”或“英雄和模範”不要寫成“英模”，也不要將“勞動模範”寫成“勞模”。要寫“抓緊時間”或“趁着機會”，不要將兩個短語合併起來寫成“抓緊時機”。“……後”，“……（之際）時”，“已……”，“且……”等，沒有“……以”，“……的時候”，“已經……”，“並且……”等來得明瞭。用“即”和“及”也不如用“也就是”和“以及”，因為這兩個字音相同，容易混淆。用“、”“和”“並”和“以”的時候，應該多考慮一下，用哪一個合適些，不要隨便用。

第二：是附加語太長，把謂語和賓語隔離得太遠，讀者一時摸不着頭腦，甚至於意思也會中斷。如“認爲要維護和平，必須反對侵略，要保衛亞洲和平，要反對美帝國主義者侵略朝鮮，更必須一致努力以行動支援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繼續打垮其武力，取得全面勝利的真理”<sup>④</sup>。“並由此推向以

提高技術，樹立制度，改善方法，改善勞動組織，學習推廣先進經驗，展開羣衆性的創造發明和合理化建議，找竅門”等爲主的正常、合理、持久、全面的道路發展”<sup>⑤</sup>。像上面這兩句讀起來多麼吃力，要一氣讀完才行，而事實上又不可能，聽起來怎麼能使意思聯貫呢？就是看起來，精神上也很緊張。看過了“認清了”半天，才又看到“真理”；看過了“推向”好久，才給它找到了“道路”。像這樣的句子實在要不得，至於句中其他修辭不恰當的地方就不多談了。

第三：是個別報紙上還用些文言中的詞兒。如“……在這場浩劫中，十有八九都光掉了。接着又是日本鬼子的搶劫擄掠。……的商業就一蹶不振”<sup>⑥</sup>。這些句中的文言詞兒或是不常用的詞兒，讓我們知識分子看來，並不覺得怎樣，如果讓初步掌握了文字工具的人民羣衆看來，一定不知道說的是什麼，尤其是“浩劫”、“一蹶不振”等，聽起來就更不用說了。

- ①②《河南日報》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我省秋季作物普遍豐收》。
- ③《新黔日報》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我省秋糧收購工作七十三縣市全面展開》。
- ④《新黔日報》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繼續加強抗美援朝工作，保衛和平》。
- ⑤《江西日報》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日《關於召開全省第二屆英模代表大會的指示》。
- ⑥《安徽日報》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日《正陽關一天天的繁榮起來了》。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號勘誤表

頁	行	誤	正
5	倒 15	chau <sub>3</sub>	khan <sub>3</sub>
5	倒 15	hau <sub>3</sub>	han <sub>4</sub>
5	倒 5	lu <sub>2</sub> zu <sub>2</sub>	lu <sub>4</sub> zu <sub>4</sub>
6	左 7	a u	a o u
6	左 23	nwn <sub>2</sub> (元音…	nwn <sub>2</sub> (武, 右) nin <sub>2</sub> (元音…
6	右 8	fmŋ <sub>2</sub>	fwŋ <sub>2</sub>
6	右 9	mmŋ <sub>2</sub>	mwŋ <sub>2</sub>
10	左 7	隱瞞蔽了	隱瞞了
10	左 倒 18	緩瑣	環瑣
10	右 倒 11		
10	左 倒 16	鄂倫春自治族	鄂倫春自治旗
10	右 11	在清統治者	清統治者



## 語法講話(七)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

### 八 主語、賓語

主語和賓語是句子中的兩個成分。主語是對謂語說的，賓語是對動詞說的。例如：

我逐漸熟悉了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毛澤東)

第一分句裏，“我”是主語，“逐漸熟悉了他們”是謂語。第二分句裏，“他們”是主語，“也逐漸熟悉了我”是謂語。這兩分句的動詞都是“熟悉了”，第一分句的賓語是“他們”，第二分句的賓語是“我”。一般地講，在現代漢語裏，主語總是在謂語的前邊，賓語總是在動詞的後邊。由意義上看，主語跟謂語有各種不同的關係，賓語跟動詞也有各種不同的關係。我們在《句子的成分》和《句子的種類》那兩節裏已經把這些不同的關係介紹了一個大概。(參看本刊一九五二年九月號和十月號。)現在再把主語和賓語提出來作一點補充的討論。

#### 1. 主語

我們以前說過，主語對謂語講有時候是“施事”，有時候是“受事”，有時候既不是“施事”，也不是“受事”，只是謂語陳述的對象。(一九五二年九月號)有些句子的主語是“施事”，就是說，在意義上主語是主動者，謂語中所說的行為是從主語發出來的。例如：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毛澤東)

這類句子的主語最容易明白，不必多加解釋。

有些句子的主語是“受事”，就是說，在意義上主語是被動者，是受謂語中所說的行為的影響的。最顯著的是謂語中有“被、受、給、叫”一類表示被動的字眼。例如：

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毛澤東)

我常是被質問，被考驗，並且被命複述當時的言語。(魯迅)

我軍攻擊部隊暫時被阻止了。(報)

大水給裹在破被子裏，抬上小船。(袁靜、孔厥)

爲什麼一個活人叫他拴住？(趙樹理)

但是最常見的是謂語中並沒有這類表示被動的字眼，而主語在意義上却是受事。比方說，“這個問題已經決，一切工作都做完了。”“問題”是人解決的，“工作”是人做完的，意義上都是受事，語法上都是主語。這句子有幾點值得注意。先從主語方面看。第一，主語多半是確定的，是已經提過或者已經知道的。例如：

我這些話說得農民都笑起來。(毛澤東)

你這話從哪兒說起？(袁靜、孔厥)

這筆賬以後再跟他們算。(袁靜、孔厥)

三麻子那個人你還不知道？(袁靜、孔厥)

那邊崗樓燒了沒有？(袁靜、孔厥)

這幾句的主語都帶有確定指示詞“這”或者“那”。有時候也用其他有限制性的修飾語來確定。例如：

你的苗也給你鋤出來了。(趙樹理)

中國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幹。(毛澤東)

大土豪、大劣紳、大官僚、大買辦們的主意就訂定了。(毛澤東)

其餘各人吃虧的事，只要各人提出，該怎麼辦，怎麼辦。(袁靜、孔厥)

有時候主語不帶任何修飾語也是確定的，也是承上的。(參看本刊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號關於有定無定的論。)例如：

那次敵人佔了斜柳村，就修崗樓。樓修好了。

飯野小隊長和郭三麻子帶着鬼子和偽軍駐

那兒。(袁靜、孔厥)

他們三個走進村公所，民事主任才寫過信，墨

還沒有蓋上。民事主任看見他們這幾個人

一塊就沒有好氣，撇開艾艾和小晚，專對燕

說：“回去吧！信已經交給你馮了。”(趙樹理)

“樓修好了”的“樓”指上句的崗樓，“信已經交給你馮了”的“信”指剛才寫過的信，都是確定的東西。

第二，主語有時候是周徧性的，表示“無論什麼”者“一切”，謂語中常常有“都、也”一類副詞。例如：



一死，什麼痛，什麼苦，都不覺得啦。(袁靜、孔厥)

什麼東西都把它掏出來。(袁靜、孔厥)

一點什麼好處都沒有。(趙樹理)

屋子裏一個人也沒有。(袁靜、孔厥)

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毛澤東)

凡是敢說敢幹的，差不多都收進來了。(趙樹理)

“什麼痛，什麼苦”是說“無論什麼痛，無論什麼苦”。“凡是敢說敢幹的”是說“一切敢說敢幹的人”。

再從謂語方面看。主語是受事的句子，謂語往往不只是一個單獨的動詞。動詞的前後多半有別的成分。

例如：

文藝批評應該發展。(毛澤東)

統一戰線必須堅持下去。(毛澤東)

公開的敵人，公開的民族破壞分子，容易識別，也容易處置。暗藏的敵人，暗藏的民族破壞分子，則不容易識別，也就不容易處置。(毛澤東)

窮家難捨，熱土難離。(袁靜、孔厥)

潮脂糕(應作槽子糕，即雞蛋糕)明天再吃。(袁靜、孔厥)

大水坐在炕沿上，頭也不抬，話也不說。(袁靜、孔厥)

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鮮，頭髮梳得更光滑，首飾擦得更明，宮粉搽得更勻。(趙樹理)

兩個鬥爭會開過以後，事情包也包不住了。(趙樹理)

崗樓上手電打得一閃閃的。(袁靜、孔厥)

該打死的沒打死，不該打死的倒打死啦！(袁靜、孔厥)

這些句子裏頭，有的是動詞前面有助動詞、副詞或別的修飾語，如“文藝批評應該發展”，“潮脂糕(槽子糕)明天再吃”。有的是動詞後面有補語，如“衣服穿得更新鮮，頭髮梳得更光滑”，“事情包也包不住了”。有的是動詞的前後都有別的成分，如“統一戰線必須堅持下去”，“該打死的沒打死，不該打死的倒打死啦！”。如果謂語光是一個單獨的動詞，要是說，“文藝批評發展”或“衣服穿、頭髮梳”，大都不像一句完整的話。

主語是受事的句子，謂語也可以是動賓結構，就是動詞後邊有賓語。例如：

某土豪罰款若干，某劣紳罰款若干，自數十元至數千元不等。(毛澤東)

喜富的村長撤差了。(趙樹理)

肩膀上中了兩顆子彈。(袁靜、孔厥)

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毛澤東)

我們人多，這幾個錢花不了幾天。(袁靜、孔厥)

一千五百字只學了十四天。(報)

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毛澤東)

也可以是主謂結構，就是謂語本身又可以分成主語謂語兩部分。例如：

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志都不要忘記。

(毛澤東)

這些工作我們已經開始做了，並且已經做出了成績。(毛澤東)

大家的事情大家辦。

不上幾個月工夫，老槐樹底的日子他就過不慣了。(趙樹理)

反正老百姓的困難，你也知道。(袁靜、孔厥)

制錢雖說不興了，羅漢錢可是誰也不出手的。

(趙樹理)

他什麼心眼兒，什麼脾性兒，我早就摸得熟透透的啦。(袁靜、孔厥)

那半個「餛飩」一人挾一小塊，分着吃了。(袁靜、孔厥)

有時候受事的主語可以有很複雜的謂語，如：

他的快板一唸出來，東頭的年輕人不用一天就都傳遍了，可是想傳到西頭就不十分容易。

(趙樹理)

“一唸出來”是動補結構，底下是兩個主謂結構。

總起來說，主語是受事的句子有這樣兩個特點：

第一，主語往往是確定的或者周徧性的。

第二，謂語往往不只是一個單獨的動詞，動詞前後常有別的成分。

主語是受事的句子，這兩個特點並不一定同時具備，有時候只有一個就行。比方說，“這個要，那個不要”。“這個要”的謂語只有一個單獨的動詞“要”字，與第二條不合，但是主語“這個”是確定的，合乎第一條。再比方說，“一件衣服可以穿三年”。主語“一件衣服”不是確定的，也不是周徧性的，與第一條不合，但是謂語並不是一個單獨的動詞，合乎第二條。古代漢語有“烏盡弓藏，兔死狗烹”這類句法，現代漢語裏很不多見。

主語是受事的句子，主語有時候可以挪到動詞的後面做賓語。比如說，“這個問題必須解決”，也可以說，“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意思沒有多大差別，不過由主謂結構變成動賓結構。有時候這樣挪動一下，意思大不相同。比如說，“冬天的衣服全都穿上了”，是說所有冬天的衣服全穿上了。假定說，“全都穿上冬天的衣服

了”，那就是說大家都穿上冬天的衣服了。有時候主語是受事的句子根本不能這麼挪動。比如說：

敵人一個也沒逃掉，有的打死了，有的活捉了。不能改成“打死有的了，活捉有的了”，因為“有的”這個代詞只能做主語，不能做賓語，所以不能放在賓語的位置。可見這類句子並不是倒裝句，只是主語在意義上是受事罷了。

以上說的是主語在意義上是謂語的受事。還有一些句子的主語既不是施事，也不是受事，就是說，主語在意義上既不是主動者，也不是被動者，只是謂語陳述的對象。這類句子可以從謂語的性質方面來觀察。第一是體詞謂語句，句子裏沒有動詞，主語當然無所謂施事或受事。例如：

牛大水二十一歲了。（袁靜、孔厥）

張得貴，真好漢。（趙樹理）

第二是形容詞謂語句，主語是描寫的對象，也無所謂施事或受事。例如：

張金龍的槍法好，膽子大。（袁靜、孔厥）

膠鞋底鞋夏天特別熱，冬天又涼又濕。（蕭紅）

第三，動詞謂語句的動詞如果不表示動作，主語自然也無所謂施事受事。例如：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

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毛澤東）

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魯迅）

二加二等於四。

第四，動詞謂語句的動詞雖然表示動作，但是表示的動作既不是從主語發出來的，也不是主語所承受的，所以主語也無所謂施事或受事。例如：

城頭上飄揚着鮮亮的紅旗。（袁靜、孔厥）

北屋東屋都點着燈，東屋在打牌。（袁靜、孔厥）

大字筆寫大字，小字筆寫小字。

王冕七歲上死了父親。

第五，一部分主謂謂語的句子，全句的主語只是提示性質。例如：

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毛澤東）

這事兒我們也沒有辦法。（袁靜、孔厥）

那個事情我不怪他。

這些句子只是把主語提出來做討論的對象，也是無所謂施事或受事的。

## 2. 賓語

我們在講《句子的成分》那一節裏（本刊一九五二年九月號）曾經列舉了一些賓語。我們指出，有的賓語是動詞行為的受事。例如：

我們要破壞帝國主義，要破壞封建主義。（毛澤東）

只有破壞舊的腐朽的東西，才能建設新的健全的東西。（毛澤東）

有的賓語是表示處所地位的。例如：

縣上的訓練班在一所大宅院裏。（袁靜、孔厥）

他們出了朱家北門，轉了幾個彎，來到一個姓陳的小寡婦家的門外。（袁靜、孔厥）

有的賓語表示經歷的一段時間。例如：

打了三天三夜，把敵人打退了。（袁靜、孔厥）

我那箱子在那裏擺了一輩子了。（趙樹理）

有的賓語表示存在的事物。例如：

閻家山有個李有才，外號叫“氣不死”。（趙樹理）

公所的房子都漏了，炕上地上盡是水。（袁靜、孔厥）

有的賓語表示主語的類別。例如：

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又是愛國主義者。（毛澤東）

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毛澤東）

此外還有副動詞的賓語，如“把門打開”，“從哪裏說起？”副動詞跟賓語的關係另有專篇討論，現在只就動詞的賓語來作一點補充。

有時候賓語是由動詞行為產生的結果。例如：

眉頭骨上打了老大一個青疙瘩。（袁靜、孔厥）

“打”的是“眉頭骨上”，“打”的結果起了“老大一個青疙瘩”。又如：

先挖沒有水的一邊，挖了幾十丈長。（袁靜、孔厥）

“沒有水的一邊”是“挖”的地方，“幾十丈長”是“挖”的結果。“牆上挖個窟窿，地上打個洞兒”，賓語都是動詞行為產生的結果。有時候賓語是動詞行為引起的結果。例如：

收的紅薯已經賣了一百多萬元。（報）

“賣”的是“紅薯”，“賣”的結果得了“一百多萬元”。表示結果的賓語並不限於敘述已成事實的句子。我們也可以說：



收的紅薯可以賣一百多萬元。

意思是“收的紅薯”如果賣出去，可以得“一百多萬元”。

“一百多萬元”是預期的結果。跟這種句法相近的，如：

一頓飯吃了三千元。

一頓飯要吃三千元。

第一句是說“吃了一頓飯，花了三千元”。第二句是說“吃一頓飯要花三千元”。“三千元”都是“吃”所引起的費用，也是一種表示結果的賓語。

這一類動賓結構最足以表示漢語的簡練、經濟。

有時候賓語好像是動詞行為的施事。表示存在、出現或者消失的句子常常是這樣。例如：

那裏有兩張大桌子，桌旁坐着幾個人。（魯迅）

黑影裏站着四五個人。（趙樹理）

遠遠的來了一大串黑影兒。（袁靜、孔厥）

敵人的後面，東邊也響了槍，西邊也響了槍。

（袁靜、孔厥）

窗窟窿口斜斜的照進來一溜月亮光。（袁靜、孔厥）

他們村裏走了一個人。

自此以後，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燈的，就很少了。（毛澤東）

這類彷彿施事的賓語大都是不確定的。“黑影裏站着四五個人”等於說“黑影裏有四五個人站着”。這“四五個人”是誰還不知道。再舉兩個比較明顯的例子：

遠遠的來了一個人，走近了才認得是小福。（趙樹理）

起初還不知道來的是誰，所以說“遠遠的來了一個人”，等“走近了，才認得是小福”。

遠遠看見大黑，三個民兵已都回來了，還來了區上一個助理員，一個交通員。（趙樹理）

“大黑、三個民兵”都是上文已經提過的，是確定的，所以說“大黑、三個民兵已都回來了”。“區上一個助理員、一個交通員”是上文沒有提過的，是不確定的，所以說“還來了區上一個助理員，一個交通員”。前面講主語時候說過，受事的主語大都是確定的，現在又知道施事的賓語大都是不確定的。說“茶拿來”和說“拿茶來”不完全相同。“茶拿來”的“茶”是預備好的茶，是確定的。“拿茶來”的“茶”不一定是預備好的茶，是不確定的。說“人來了”，指已經提到或者已經知道的人，也是確定的。說“來人了”，只是表示“有人來了”，不一定知道是誰，是不確定的。（參看本刊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號關於肯定無定的討論。）

另外還有一種賓語類似施事的句子。例如：

這一鍋飯能吃三十個人。

意思是“這一鍋飯够三十個人吃”。這句話的否定式是：

這一鍋飯吃不了三十個人。

意思是“這一鍋飯不够三十個人吃”，是說飯少了。如果說，“三十個人吃不了這一鍋飯”，那就是說飯太多了。所以“這一鍋飯可以吃三十個人”或“這一鍋飯吃不了三十個人”這類句子也並不是倒裝句，也只是賓語在意義上好像是施事罷了。

有一部分數量詞表示行為的數量，叫做動量詞，如“一回、兩趟、三下”等。動量詞常常放在動詞的後頭做賓語。例如：

我對你說過不止一回，教你常勸勸他。（老舍）

老二，你去一趟吧。（老舍）

“披、披、披”一連打了好幾下。（趙樹理）

動量詞也常拿行為憑藉的工具表示。“踢一脚”是用腳踢一下，“打兩棍”是用棍子打兩下。例如：

他們已經殺了第一刀，這個傷痕是很重的。（毛澤東）

大水的光腦瓜兒上也挨了幾棍子。（袁靜、孔厥）

張金龍照準小梅，就打了兩槍。（袁靜、孔厥）

動量詞做賓語可以跟別的賓語連用。跟代詞的賓語連用的時候，動量詞必須放在代詞的後頭。例如：

這學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我總是推宕着沒有來。（魯迅）

人家沒罵過我一聲，沒打過我一下。（老舍）

小飛蛾見他一進門，照例應酬了他一下。（趙樹理）

你告訴我們一聲，我們也痛快點呀！（老舍）

難道叫我每天看你幾眼。（趙樹理）

張金龍狠狠的踢了她一脚。（袁靜、孔厥）

跟名詞的賓語連用，動量詞在前頭的時候居多。例如：

你問她一冬天拈過一下針沒有？紡過一寸線沒有？（趙樹理）

我九天賣九趟煤，五九賺四斗五。（趙樹理）

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幾件首飾。（趙樹理）

咱還管過好幾回過路軍人的飯。（趙樹理）

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收了四回俸錢了。（魯迅）

因為回了一趟衛家山的娘家，住下幾天，所以來得遲了。（魯迅）

他已經上過二十多次醫院了。（老舍）

三麻子很着惱，射了一眼崔碯碌。（袁靜、孔厥）

不過跟指人的賓語連用時候，動量詞也常常在後頭。例如：

于福跪在地下哀求，神非教他馬上打小芹一頓

不可。(趙樹理)

她看了艾艾一眼，艾艾仍然睡得那麼酣。(趙樹理)

二諸葛的脾氣又上來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

“由你啦？”(趙樹理)

媽！王先生是咱們的恩人！他救過妹妹兩次。

(老舍)

就是跟一般名詞的賓語連用的時候，動量詞有時候也可以在後頭，比如說，“每月看兩次電影”也可以說“每月看電影兩次”。“他上星期去了一趟天津”也可以說“他上星期去了天津一趟”。不過說“每月看電影兩次”，“他上星期去了天津一趟”，記事的意味比較重些。

動詞和賓語的關係是說不完的。我們以前說過，“有各種不同的動詞，因此動詞跟賓語也有各種不同的關係。”(見本刊一九五二年九月號《句子的成分》。)其實就是同一個動詞也常帶各種關係不同的賓語。比如，“寫文章、寫黑板、寫魏碑”，“寫”字跟這三個賓語的關係都不一樣。“寫文章”是做文章，“寫黑板”是在黑板上寫，“寫魏碑”是摹倣魏碑寫字。“吃飯”是把飯吃下去，“吃大碗”是用大碗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依賴山水爲生。“糊窗戶”是把窗戶糊起來，“糊紙”是用紙糊上去。“洗衣裳”是把衣裳放在水裏洗，“洗涼水、洗熱水”是用涼水、用熱水洗澡。“夏天在海岸上吹風”是讓風吹。“冬天在山坡上曬太陽”是讓太陽曬。“跑街、跑路”是在街上、在路上跑。“跑公事，跑買賣”是爲公事，爲買賣奔跑。“下山、下樓、下車”是從山上、從樓上、從車上下來，是離開那個地方。“下水、下田、下鄉”是往水裏，往田裏，往鄉裏去，是走向那個地方。“下命令”是發下命令，“下決心”是立下決心。就是同一個動賓結構，動詞跟賓語也有時候可以表示兩種不同的關係。“下船”普通是說從船上下來，可是也間或指往船上去，

等於說“上船”。“借錢”可以是借出去錢，也可以是借進來錢。

有的動詞是兩面性的，主語跟賓語可以互換，意思上沒有大差別。“一個大餅夾一根油條”也可以說“一根油條夾一個大餅”。“三四個人蓋一條被子”(袁靜、孔厥)和“一條被子蓋三四個人”意思也差不多。

最後我們再從賓語和主語的關係上提出幾點討論一下。前面已經說過，有的賓語是主語的類別，比如說，“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敵人”。有時候賓語是主語轉化的東西，比如說：

天氣很冷，河裏水都結成冰了。

棉花可以紡紗，紗可以織布。

有時候賓語是複指主語的代詞。例如：

過去的事不要提它吧。(趙樹理)

一切危害人民羣衆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

切人民羣衆的革命鬥爭必須歌頌之。(毛澤東)

有時候賓語表示主語的數量。例如：

橘子蘋果買了一大堆。

青菜要多喫一點兒。

三十多架葡萄就摘了一萬多斤。

各色破布不知糊了多少層。(趙樹理)

有時候賓語表示主語數量的一部分。例如：

戒指怎麼只剩了一隻？(趙樹理)

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魯迅)

剛好他手下的保衛團丁回來了幾個。(袁靜、孔厥)

“戒指怎麼只剩了一隻？”是說“戒指”原有兩隻，現在“怎麼只剩了一隻”。“他手下的保衛團丁回來了幾個”，“幾個”也只是“保衛團丁”的一部分。

## 北京郵局聯合啟事 人民教育出版社

爲迎接國家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徹底克服期刊發行工作中的盲目性，逐步走向計劃化，新華書店及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發行及總經售之京版各種期刊，均交由北京郵局發行。《中國語文》原由新華書店發行，自一九五三年一月起亦全部改交北京郵局發行，全國各地郵局均可訂閱及零售，新華書店仍照常辦理代訂代售工作。各地原有訂戶亦轉移北京郵局繼續發寄，如有查詢事項，請函北京郵局發行處期刊訂閱科。一九五三年開始之新訂戶，則請直接與當地郵局聯系。



# 廣西僮族的方塊文字

韋慶穩

廣西僮族從前是有自己的一套方塊僮字的。這種方塊僮字，就像越南的舊文字一樣，是借用漢字來標自己的語音的。在這以前也許有過僮族的原始文字，可是這種文字目前已經絕跡，只有徐松石在桂平縣都合地方發見過一塊刻有古代僮族原始文字的石碑（見徐著《粵江流域人民史》）可以證明。

按照正常的情形來說，每一個民族既然有自己的語言，就應該有自己的文字。但中國境內許多少數民族過去因為在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下有好些是未曾有過文字或者有過文字而沒能普遍推行的。所以今天中央人民政府號召：“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幫助文字不完備的民族逐漸充實其文字”，這是絕對正確，而且勢在必行的。廣西僮族自己的語言雖然普遍全省，然而已經沒有自己通用的文字了。殘存的舊方塊僮字至今已不普遍通用，就是用的，字形也多紛歧，所以現在僮族的文字問題已然不是要改良而是要新創了。可是在推行新創拼音僮字之前，我們來研究一下過去那種方塊僮字還是有必要的。

方塊僮字過去在廣西僮族人民中間曾經應用過。我們的證據和理由是：第一，宋代范成大曾經在桂林作過官，在他所著《桂海虞衡志》裏說：“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區皆然。”他所舉的例字是“姦”、“姦”、“天”、“畝”，字形與所註音義，完全跟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方塊僮字相同。第二，這種方塊僮字在廣西各縣僮族人民中間都有，所記故事和詩歌，內容和形式大致相同。字的音韻和聲調按着一定規律發生變化，但字形却始終如一。這些現象，只有假定過去曾經應用過，才能找到適當的解釋。第三，清初，曾經有《太平府夷語通譯》專門收羅這種方塊僮字，若不是過去曾經應用，是不會引起皇帝和大臣們注意，以至把它們收羅到文獻上來的。第五，明末，廣西中部有一個中過舉人的僮族，名叫韋志道，他不但善於漢文漢詩，而且對於僮文也很熟練，他曾經用僮字創作過許多美麗的僮話詩歌，傳誦當時。

根據上述理由和事實，我們可以相信，這種僮族方塊字，在過去是曾經通用過的，直到後來才逐漸為漢字所代替。只有道士錄經文，一般人寫僮歌，在契紙上寫

地名，還普遍應用它，也有些農民用它來通信。

解放以後，各縣僮話新歌普遍流行，但所借用的漢字，非常零亂，已經不是原來的僮字了。

我們肯定了方塊僮字過去曾經應用過以後，再來考訂它產生的年代。因為文獻不足，方塊僮字產生的確實年代很難考訂。但憑着下列幾個理由，我們估計它產生在唐朝，是頗有可能的。第一，僮族方塊僮字的產生是表示着僮族人民更進一步受漢族文化影響的結果。中原經濟文化大規模向南方發展，是從唐朝開始的。在這個時候，僮族人民借用漢字來表達僮語，造成一種方塊僮字是很有可能的。第二，漢族文人學者在兩漢時代，就已開始用漢字作音符來記錄僮話，如楊雄《方言》中的“犛，牛也，”、“𪛗，式六切，虎也”、“𪛗，魚也”等等，音義都跟僮話相合。又如相傳的越人歌裏面的方言詞彙，很可能有些就是古代的僮話。（越人歌裏的字，有一部分與現在流傳的僮字相同）但這些音符的使用還是帶有偶然性的，個別的，因此尚未成為通行的文字，它們僅僅是唐代方塊僮字的前身。第三，從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的文句看來，證明在宋代，方塊僮字已在廣西僮族人民中間應用。可是由開始產生到實際應用，是要經過相當長時期的。因此，我們估計它大約產生在唐代。同時，[唐代南詔已經有許多新造的方塊字，也可作為佐證。第四，現在尚流傳的僮話歌本中，有董永行孝的故事，文體和故事內容跟在敦煌千佛洞所發現的唐代變文殘卷相類似。第五，方塊僮字所借漢字的音讀，多為隋唐音讀，而不是現代南方官話的音讀。第六，現代僮話雖然已分化成一些不同的方言，因而僮字的音讀也發生了一些小的變化，但字體却始終如一，例如“皮往”（兄弟），“添”（與），“拎”（拿），“徐”（拿），“淦”（水），“那”（田），“弄”（山中平地），“吞”（見）……等，這可以說明方塊僮字是產生在僮話未分化為現代方言以前的。李方桂雖然否認這是文字，然而他却根據“𪛗”、“𪛗”、“𪛗”（眼、死、手）等字各處讀音的不同，說：“也許有古時造的字，後來音韻變遷所以不甚相合了”。（《武鳴土語》）按照一般語言通例，一種語言的分化，是要經過相當長的時期的。

根據這些事實和理由，我們認為在漢代只有初與僮人接觸的漢人用漢字來記錄僮話。這種用作僮話音符的漢字，並未在僮人中間通用，甚至僮人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到了唐代，這種標記僮話音讀的漢字，才開始當作文字應用。到了宋元明七八百年中間，才在廣西僮人中間逐漸通行。可是後來被反動統治階級壓迫的結果，廣大的僮族人民不能普遍提高文化，以致僮字變成了殘存的形態，不大通用。解放後，用新方塊僮字記錄僮歌的雖然很多，可是各處，甚至各人所借用的漢字多不相同，已經失掉了作為一個民族交際工具的文字作用了。

現在我們來討論方塊僮字的構成條例。

(一)借音：就是借用漢字的聲音來表達僮話的意思，例如：“劉”(我們)，“弄”(山谷)，“晚”(村莊)，“陷”(夜)，“龍”(下降)，“九”(我)……等，所借漢字的聲音，是古代的字音，但也未必能完全符合，原因是：借的也許僅僅是近似的聲音，也許由於現代僮話聲音變了。

(二)音義兼借：這就是實際語言的借字，而不是僅僅文字上的借字。例如：“花”、“心”、“金”、“銀”……等，這些漢字的原來讀音，大致與僮話相同或相近，意義也相同。

(三)借義：這就是借用漢字的意義而僅發僮音的一類僮字，例如：“蕉”，“笑”，“木”等字皆讀僮音而取漢義。

(四)自造的形聲字：就是一個僮字由兩個漢字合成，一邊取它的意義，另一邊取它的聲音。例如：手爲“撻”，從手，逢聲；睡爲“胖”，從月，年聲；妻爲“妹”，從女，米聲；說爲“咧”，從口，列聲；問爲“叵”，從口，三聲；水爲“淦”，從水，念聲。當然，那些字的聲音，也未必完全相同。

(五)自造的會意字：就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漢字的形體構成，完全不取漢字的聲音，也不單取某一邊漢

字的意義，而是取它們意義結合起來所產生的一種新意義。例如：“朧朧”(月亮)，“磊”(砌石爲堆)，“迺”(重)，“叢”(矮)，“聶”(賤)，“蓑”(枯萎)。另有一些字是由兩個意義相近的字重疊起來，例如“塋”(土地)。又另有一些字是取漢字的單邊，例如“尸”(一邊)。以上這些，都是僮族仿漢字造字條例並且借用漢字創造出來的會意字。

(六)借字：就是僅僅借用漢字的形體，而聲音與意義，都不相干的字，例如“可”(面)，“往”(弟妹)。

(七)自造的方塊字：例如“𠂔”(做)，“𠂔”(大)，“𠂔”(要)。這些也許是漢字的省寫或簡化的草書。

上面所舉的七類僮字中，以第一類的字最多，第二類、第三類、第四類的字次多，第五、第六、第七三類的字比較少。如果跟日本文中的漢字比較，第一、第二兩類，相當於日本文的“音讀”，第三第六兩類，相當於日本文的“訓讀”，而第四、第五、第七等三類，相當於日本文的“國字”。不過所謂相當於“訓讀”和“國字”的，都是一字一音的。

這種方塊僮字，過去大約一千年中，在僮族人民中間是有過一定的功用的，然而到了現在，儘管還有少數人用它，但一般說來，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首先是因爲它難寫難學，所以無論如何，我們不應該在今天再來提倡。至於漢語漢字，對於提高僮族廣大勞動人民的文化的效果是很緩慢的，對於初受教育的兒童，也是很不適當的。因爲那陌生的漢語和漢字，對於他們的學習，是雙重的負擔，我們很難想像只操自己民族語的那個民族的人民，能通過另一個民族語文的學習來普及並發展本民族的文化。因此，拼音僮文的創造和推行，是刻不容緩的了。等到僮族文化普遍提高以後，爲求中華各民族團結互助的大家庭更加鞏固，我們相信僮族人民一定會在本族語文以外加緊學習中華各民族的共同語文來共同努力祖國的建設事業的。

(接3頁)各地人民容易學習將來拼音文字所依據的標準語，也是值得研究的課題。我們希望全國各地方熱心參加文字改革的朋友們能對這些問題給以更大的注意。不要再費精神來創造新字母了。有人錯誤地把創造字母和發明新技術一樣看待，甚至還有要求取得發明權的，這當然是少數人的誤會，也得在這裏解釋一下。字母的創造和工業上新技術的創造不同，後者是越多越好，都有應用的機會，但是前者只能有一種被採用；

後者的範圍無限，但是前者的範圍是有限的，經過幾十年來許多人的分途研究，各種方案已經應有盡有了。爲了要我們有套比較切合實用的好字母，過去一些有代表性的方案都得參考研究，吸收它們的優點，解決它們沒有解決的問題，所以這些方案就是沒有被採用，也有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它們的創製者的努力並不是浪費。但是今天如果還要重複這些工作，那就是浪費精力了。(伯韓)



## 在語文教學中怎樣講解作品的思想和感情

陳傳忠

這裏所談的只是以高中語文課本第二冊中馮至的《莫斯科》一文為例的課堂教學的一部分，重點只放在怎樣講解作品的思想和感情方面。

在教《莫斯科》課文之前，我先選教蘇聯文化工作者代表團代表杜伯洛維娜來參加我國開國典禮後所寫的《在新中國》一篇散文，為的是培養同學熱愛祖國，以及熱愛蘇聯的深厚感情。因為作者在本文中表達了對新中國的新氣象無限讚美，以及中蘇兩大民族團結友愛的感情。教後組織同學集體看《錦繡河山》電影，又叫每人寫了一篇歌頌祖國偉大的文章，這給閱讀《莫斯科》打下了思想和感情的基礎，因為這兩位作者在不同的角度上都有力地表達出對祖國的無限崇敬和讚美的情緒。

### （一）講授本文的原則

《莫斯科》是一篇內容簡單，文字淺顯，但感情却非常豐富的文章。內容簡單，文字淺顯，並不是說沒有什麼可教而必須搬了許多政治材料“泡”進去。正因為這樣，我們必須使同學深刻地細緻地體會作者的思想與感情，鞏固思想認識，培養這些感情，並從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有了正確的認識，才能產生強烈的感情，深化感情。這就是《實踐論》所說的“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理解它，只有理解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

文章裏洋溢着豐富的感情，這是作者在看到了莫斯科以後對它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的表現。教課時必須使同學盡量形象化地看到作者思想感情產生的現實基礎，這樣才能深刻認識而且體會作者的和感情。這就是《實踐論》所說的“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向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我們使教學形象化就是為着使同學能生動親切地接觸到所要了解的事物，決不是為着好玩，所以教時要防止使同學產生客觀欣賞情緒或停在好奇的階段上，因為這樣就不可能培養啟發正確的思想與深厚的感情。

### （二）課文講解的內容

#### 1. 主題思想和講授目的

《莫斯科》的主題思想是由莫斯科建設的偉大精美，以及文化藝術的優越說明蘇聯一切都是肯定的、光明的、充滿着生氣的，並且由此顯現出蘇聯人民偉大的創造性。

教授本文的目的是要同學從認識莫斯科而發生強烈的嚮往蘇聯的情緒，從而加強建設祖國的信念，產生熱愛祖國的感情。

#### 2. 段落分析

第一段作者以詩一樣的文字表達他對莫斯科無限敬仰的情緒。這一段文章的感情寫得非常細緻，同學不容易得到深刻的瞭解，因為同學在還沒有像作者一樣從莫斯科具體的事物中得到一定的印象之前，是不易激起感情的，所以第一遍我只是大略地解釋一下文字的意義。“這幸福……既不像舊日的香客們參拜了一座神廟戴福回家了，也不像疲勞的旅客在一個旅館裏睡了一夜好覺又走上長途”。說明這幸福是如何實際，一點都不空泛渺茫，也不淺近庸俗，而是充滿無限美好的理想。為着說明作者所說的“這幸福是難以形容的”，我朗讀了丁玲所寫的《莫斯科——我心中的詩》一文的頭一段，特別注意這幾句話：“人們常常很慎重的甚至一時不願講出來他最愛的東西，如同他愛一個人，他覺得不能隨便講，他怕別人誤解，便特別有所考慮，又如同我們愛毛主席，愛的很深，應該講出來，有時却也不願講，怕隨便說了反表現為一種淺薄，有損於我們的真誠。”這幾句話引起了同學對莫斯科強烈的想念，他們都張着眼睛等待接受新的事物和作者細膩優美的感情。

接着作者以三大段文字敘述莫斯科的城市街道與地下鐵道的建設。

在第一部分關於莫斯科整個城市建設的設計，我着重說明“蘇聯最善於處理舊社會的遺產……”以及新的社會制度如何呈現着新的氣象。接着我朗讀了老舍的《我熱愛新北京》中關於龍鬚溝的一段，因為許多同學都看過《龍鬚溝》劇的演出，聯繫起來不但可增加課文內容的形象化，同時也可以使同學深入瞭解新的社會制度如何促使新事物發生。此外我又讀了該文中另一段，現在北京像一個古老美麗的雕花漆盒，落在一個勤黽的人手裏，盒子上的每一凹處都收拾得乾乾淨淨，再沒有一點積垢。這樣可使同學們能夠把從莫斯科到北京，從蘇聯到祖國的感情聯繫了起來。

我很注意講解地下鐵道那一節，因為這正如作者所說的，“顯示出社會主義國家偉大的氣魄”。

為着使同學體會這一句話的深刻意義和熱愛蘇聯的感情，我採取了下面的幾個步驟：在開始講授課文之



先，我說了一個簡單的故事，卓姬的母親如何帶了小卓姬去參觀地下鐵道，從而給她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卓姬！同學們一切思想與行為最高的典範！誰不用全部心思來學習她呢？我介紹這個故事後，同學們非常企望着閱讀這段描寫地下鐵道的文字。就在同學們焦灼期待的眼光下我展開了五幅彩色的蘇聯地下鐵道的畫片並讓他們傳觀了一遍（因為我怕他們遠看看不清楚，同時那一段課文沒有把地下鐵道細緻地描寫出來）。像看到了神話中奇觀一樣，黑暗醜陋的地下會變成這樣光明美麗的世界！同學們又是羨慕又是驚奇。接着分析課文時我憤怒地告訴同學們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儈們如何污蔑偉大的蘇聯說“社會主義國家不尊重個性”，讓他們看一看這些“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設置，不同的色彩”的地下鐵道吧，他們那些庸俗的議論是多麼愚蠢無聊而且可恨啊！

這時，我才以崇敬嚮往的心情熱情地重新朗誦本文第一段歌頌莫斯科的文字：“莫斯科，斯大林時代的莫斯科，你是全世界進步人類的北極星，哪一顆發光的星辰不在瞻望着你？我來到你這裏，感到一種幸福，我離開你，也感到幸福。”這時同學已深深地感染到了作者的感情了，因為他們也像作者一樣看到了莫斯科偉大美麗的建設，看到資本主義國家醜惡的面目。

接下兩段是描述蘇聯政府如何愛護它的人民，給他們各種優美的娛樂教育，同學從課文中看到奧布拉斯夫如何把簡單的原始性的傀儡發展創造成具有高度教育意義的傀儡劇，不但兒童喜歡，連大人也被吸引了。這裏具體地說明了蘇聯人民的創造性。因此，我們可以聯繫到我國流行民間的牆頭戲、傀儡戲在國民黨的反動教育下老百姓只用作“謝神”“敬神”的工具，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裏不久的將來也會有新的創造與發展。

在講到莫斯科大劇院裏的巴雷舞那一段文的時候，我把搜集的幾幅巴雷舞的畫片拿給同學看。同學看到畫中那些像要飛起來的婉妙的舞姿，幾乎驚佩得發呆了。在同學對這種藝術有了強烈的印象後，我根據課文的內容分析蘇聯人民如何把這些從前宮廷裏的貴族藝術改造為有健康內容適合人民大眾要求的藝術。和巴雷舞這種美麗的、奇幻的藝術相對照的是本段下一部分所敘述的特列傑亞柯夫畫院裏另一種現實主義的藝術。院裏每幅的畫像描寫着蘇聯人民過去在沙皇統治下悲慘生活的面貌，以及殘酷的革命鬥爭的故事，和今天幸福快樂的生活以及“偉大的未來”的遠景。

正如作者在這一段文章的結尾所說的，“這裏（畫院裏）的形象一切都是肯定的、樂觀的、光明的，這些

鮮明的色彩反映着蘇聯人民的實際生活，正如大劇院的舞劇反映着蘇聯人的想像一般。”蘇聯人從現實到幻想，有着創造現實的偉大力量，也有着無比美麗的幻想，這兩句話使同學從莫斯科美麗的事物進一步認識到創造這些事物的人。這裏我引了丁玲在《蘇聯人》中所說的：“他們不只是要提高人們的物質享受，而是要提高人的思想、理想、感情和行動，人不是為自己，而是要有為人類事業樂於犧牲的品質。”也只有能為人類事業而樂於自我犧牲的人才會像蘇聯人那樣有高度的藝術，最偉大的創造！

課文的最後一段的內容是“蘇聯人肯定的、樂觀的生活促使一切在發展，在這發展中不斷改變舊的，創造新的。……”我在分析促使一切新事物發展的主要原動力是新的生活、新的社會制度之後，聯繫到我們應該熱愛有了新的社會制度的祖國，因為新的社會制度保證了我們有像蘇聯人那樣新的幸福生活的前途（這裏應注意避免冗長的乾燥的“政治說教”），因為我覺得同學經過了上面那些形象化的教育之後很容易得出“熱愛蘇聯熱愛祖國”的結論，而且我在分析了這一段課文最後一句話“莫斯科的發展是無窮無盡的”之後，以無限嚮往崇敬的心情又重新朗誦第一段課文的幾句話：“我來到這裏，感到一種幸福，我離開你，也感到幸福。……這幸福是實際的，因為在你這裏我瞭解了許多事物；這幸福是理想的，因為從你這裏我望見世界上更多的更美好的遠景。”再一次誦讀這樣內容深刻、感情豐富、詩一般的語句，以激發同學嚮往蘇聯的感情，並聯繫到我們祖國光明的前途，使同學能把對祖國和蘇聯的感情融成一片，達到了教學的目的。

像文章開始時一樣，作者以充滿無限嚮往感情的詩句來結束這篇文章，使讀者能夠把這些意味深長充滿信心的感情久久地留在心裏。

作者這樣寫道：

在白天，我們看見列寧墓前參拜者的行列是永久不斷的。  
在夜晚，我們望着克里姆宮塔頂上紅星的光芒是永久不滅的。

在朗誦了這詩句之後，我在同學面前展開了一幅四開大的彩色的克里姆宮的畫片，那塔頂上的紅星正發射着鮮豔的光芒，接着我用一些簡短有力的語句解釋道：

1. 全世界人民  
從白天到夜晚  
從夜晚到白天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  
正沿着馬克思列寧所指出的道路前進！



2. 他們來參拜  
不，來宣誓  
爲着全人類的徹底解放  
將革命進行到底！

3. 從白天到夜晚  
從夜晚到白天  
在克里姆宮裏的  
斯大林同志  
正無限地關懷我們  
教導我們：  
如何取得革命的勝利，  
讓革命的紅星  
每時每刻地  
發射更亮的光芒，  
照耀更遠的地方。

爲了增加同學對蘇聯嚮往的感情，我又朗誦了艾青的長詩《寶石的紅星》（《人民文學》三卷三期）。這樣，使同學更進一步地瞭解課文最後那兩句詩的意義，同時認識蘇聯對全人類革命事業的貢獻是全世界人民美麗將來的保證，以加強我們革命的信心。

在同學凝神聽了長詩之後，我重複朗誦第一段，結束了本文的講解：“莫斯科，斯大林時代的莫斯科，你是全世界進步人類的北極星，哪一顆發光的星辰不在瞻望着你？”。

### 3. 分析文章結構及表現形式

我掌握從分析表現形式來加強思想內容的體會以及從思想內容來分析表現形式的恰當這個原則，因爲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是統一的，也就是政治與藝術是統一的。

我在分析《莫斯科》一文的結構時着重下面這幾點：

1. 作者如何選擇材料來表達一定的主題思想：  
本文內容題材都是有關文化藝術建設方面的成就（城市設計也是一種藝術創造）。作者不把別的建設如工廠集體農莊等也寫進本文裏去，這就說明作者能夠選擇最恰當的題材。因爲誰都知道高度文化藝術的建設必須在一定的優越的經濟與政治的建設基礎上，正如作者所說的“我們的社會基層在改變，無論人或物都要隨着改變，”這就說到了問題的**本質**。從這裏使同學進一步認識優越的社會制度與優越的文化藝術的關係。

2. 作者善於選取非常突出的生動的最有代表性的材料。除莫斯科城市建設的設計，以及地

下鐵道外，作者寫了那些資本主義國家最不注意的兒童娛樂以及他們認爲微不足道的原始藝術傀儡戲。這些不但顯示出蘇聯人民的創造性，同時更顯示出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使同學明確地了解應該愛什麼恨什麼。

3. 作者能够非常恰當地表達一定的思想與感情，例如描寫莫斯科城市的建設不從一街一道不厭其煩地描寫，而是概括了一個強烈的印象，“新，到處呈現新的精神，”並把它和歐洲各國的城市作對比。地下鐵道也一樣不是客觀主義地描寫每個雕像如何精美，每個車站如何富麗，而是有力地深刻地說明蘇聯工程師藝術家的偉大成就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儈們無恥的污蔑來表達愛憎的感情。

此外我們應該了解本文許多地方不是單純地描寫景物，而更重要的是從描寫事物之中表現作者對於現實的態度；正如《人民日報》社論所說的：“藝術家的責任，就是要揭示這種力量（推動生活前進的先進力量），用最大的熱情來表現這種力量，使他成爲千百萬人的榜樣，鼓舞人民去爲美好的理想而鬥爭。”（《人民日報》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社論《繼續爲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文藝方向而鬥爭》）

由於本文作者自己有了這樣的思想與感情，才會寫出以愛國主義的精神教育人民的作品。

幾個體會：

1. 在語文課中要收到政治思想教育的效果，必須把課文的主題思想與作者的感情恰當地灌輸給學生，感染他們，使他們能够充分接受作者的思想感情，做到有所愛有所憎。

要作到這一點，教師必須發掘文章裏的思想內容，深刻體會作者的情感，把作者的思想感情變爲自己的思想感情，然後從講解時的聲音態度表情中適當地表達出來。

2. 找補充教材是爲了使作者的思想與感情更加明確，使同學易於接受，所以補充材料必須圍繞主題思想和作者感情，分量必須恰當，決不是“泡進”甚麼政治理論或掛上“政治教育的尾巴”。

3. 聯繫實際要根據同學的水平，自然地啟發，像水到渠成一樣，不是生拉硬湊，牽強附會。

4. 要把文章的表現形式與思想內容結合起來，講解不可離開主題，支離破碎地來分析甚麼“文章結構”“描寫方法”。

# 語文課堂教學的幾個主要體驗 (下)

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連成中學教務處

## (三)怎樣按課文順序,提出問題來講解課文

按着課文順序,提出問題來講解課文,是我們從實際出發的教學上的一點體會。我們感到這是能够比較準確地指導學員寫作的方法,也是達到精講多練的條件。因為它是從研究學員的寫作實況(從中找出主要的、合乎寫作發展規律的問題)開始,而以指導學員寫作結束的一個過程,它能使講解課文時重點明確,條理分明。

下面是我們進行這一工作的情形。

1. 研究學員的寫作,找出主要的問題,作為講授的重點:

我們是以研究學員寫作做為製定單元的依據之一。這一點,在單元編排上,已經有詳細的分析。這裏只把我們進行「責任」一課之前在這方面所作的具體工作談一談。學員在寫作上普遍地存在着的毛病是:(1)取材廣泛而不深入,有些作文,材料不分主次;(2)喜歡講道理,或較為籠統抽象;(3)把人物的思想感情當成一個固定的東西;(4)不能按照事物發展的情形來寫人物的思想感情,以致人物思想感情的變化寫得很突然,不近情理。我們分析了產生這些毛病的原因,是由於學員對於事物認識不深。他們不能深入地探索事物的本質,寫作時便必然地感到不能說明問題,因而從橫面去搜集材料,把材料寫了一大堆然後再補充說明道理等類現象也就產生了。

其次,當時我們還只講了寫人物要寫出他的思想本質,以及促使其思想本質產生的原因,學員對人物思想本質的認識還不够深刻。我們確定:「把人物思想當成一個固定的東西,不知道從聯繫發展上去觀察」是最主要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使學員深入到人物與事件的內部中去觀察分析,是合乎寫作發展規律的,而其它的次要問題也可以聯帶解決。

我們提出:「人物的思想不是固定的孤立的東西,它是活動的發展着的,與客觀環境密切聯繫着的,」這一點為當前必須解決的重點問題。(這是從學員寫作發展情況中提出的問題,它不會落在學員寫作的後面成為尾巴,也不會脫離學員寫作的實際需要,成為懸空的東西。)

2. 找出與問題相適合的對學員啓示最大的課文當教材,使講解問題能符合課文的順序,達到邊講,邊提問題、邊記筆記、邊思考消化的目的。

我們選擇「責任」這一課當教材,因為:(1)它是通過對一個人物內在思想活動的描寫來表現其本質的,而且對客觀環境與人物思想的關係交代得清楚明顯,易於講解上述問題;(2)它所寫的內容,跟我們學員生活很接近;能啓示學員從日常生活中去發現材料和發掘材料內部的意義;(3)原載「責任」的集子上,敘述這篇文章的寫作經過正符合我們學員寫作的情況。(<責任>原作把文中人物李國興的出身和過去表現等寫了很長的篇幅,才接觸到扶病搶救桌子的故事,把搶救時李國興的思想活動略去了。載<西北寫作研究>第二集。)

為什麼要使問題符合課文順序呢?我們的教學是要通過課文啓發學員認識生活,獲得寫作上的知識的;它不是抽象地灌輸理論,是通過課文的具體內容讓學員去認識。因此,課文是教學中最重要的東西。如果為了講問題而割裂了課文或紊亂了課文,那麼學員領會的就只是一些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教條。教條無助於提高學員寫作能力。把問題溶解在課文中,使學員從具體課文上去認識理論,理論才可能反過頭來指導學員認識生活,提高寫作的的能力。

在選擇教材以前,教員只能確定一個總的目的,提出一個總的問題,而關於問題的細節,則是在按照學員寫作的需要去研究教材時,根據教材的具體內容和特點提出來的。

這一課,我們依照課文的特點把上面的問題補充了四點:

(1)產生思想活動的原因(如環境、人與人的關係等)要交代清楚;(2)人物的思想是活動的,發展着的,這發展就是新舊思想鬥爭的形態,寫人物思想要寫出它的鬥爭過程來(即提出問題);(3)客觀環境的變化,會影響人物的思想變化,但決定人物行動的還是人物的思想本質;(4)寫出人物的思想鬥爭的結果,也就是寫出人物的思想本質。(也就是文章中解決了的問題。——在講主題時,我們就已經提出:每篇文章都得解決一個問題。)



啓示學員認識生活，發現材料發掘材料與選擇材料的第一個步驟是講故事。

講授課文時，我們採取的辦法是先講學員寫作上或生活上的故事，讓它們去分析，（主要的是讓學員認識自己寫作中的毛病，對事物錯誤的看法；但爲了不打擊情緒，還應適當地拿學員的好作品穿插。）接着朗讀課文中能跟問題相結合的部分，跟上項對比。教員再各加啓發讓學員思考，發表意見，接着便根據學員了解的程度去分析課文，提到理論原則上去，把問題寫出來。這種講法的好處：第一、教員在課堂中起了指導作用，而不是唱獨腳戲，因爲每個學員都必須開動自己的腦筋；第二、它是由淺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由具體到原則而又回到具體事例上來的，所以我們說是通過具體事實讓學員去認識生活，提高寫作。例如《責任》課文的第一部分把當天的情況（也就是環境）——大家不在家，天快下雨了，院子中擺着許多新桌子，交待的一清二楚。這正是李國興產生思想的原因。接着，課文寫李國興爬起來去搬桌子，但因頭發昏，身體發軟而又躺下去了。這正是寫出了人物思想活動，思想鬥爭狀態——提出了問題。環境改變了，風雨越來越近，這情勢使得李國興的思想鬥爭越來越激烈。這說明環境對人物內心發生了影響。但是能使李國興扶病起床去搶救桌子的是李國興的本質——愛護人民財產的本質，不是下雨；下雨並不能使任何一個人都克服身體上的痛苦去搶救人民的財產。這正說明人物的思想本質是決定行動的。從那裏去發現李國興的思想本質呢？那不正是李國興思想鬥爭的結果嗎？從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本身的聯繫性、課文的嚴密的結構以及問題內容與課文之間密切的聯繫上去思考，就使我們能夠辦到，按照課文的順序把擬講的問題溶解到課文裏，通過課文使學員領會了問題；而講解的方法，正是邊講課邊提問題，邊記筆記，邊思考消化。同樣課文終結，問題也完整地提了出來，這時只要簡明扼要地一說，就能給學員一個深刻的明確的完整的印象，使他們能夠在生活上和寫作上去運用。

這以上就是我們進行按照課文順序，提出問題講解的一點小體會。

#### （四）聯繫實際與通俗化問題

##### （一）聯繫實際問題：

講解課文中聯繫實際的工作，是在對學員寫作有深刻了解與準確估計以及有計劃的教學前提之下進行的。要作好這一工作——使學員對所講的東西有極深刻的印象，幫助他們提高寫作的能力，需要熟悉課文，掌握學員的寫作實況，還需要廣泛地蒐集學員寫作中

的具體例子，儘可能地熟悉學員的生活，了解他們的思想。怎樣去找例子呢？

甲、從學員的生活裏（包括思想）找例子：我們在講解立場觀點不同對一個問題認識就不一致這一問題時，學員寫作中立場不明確的極少，因此不容易從中找到例子把問題講清楚。於是，我們便從他們生活上去找，恰好當時有這麼個事：幼稚園的孩子們都長得很胖，同志們都非常喜愛，可是有一個同志鬧情緒，他說：“幹部們的孩子都養胖了，我還是光桿一個，當兵的就是吃不開。”經過批評和幫助，這個同志後來思想改變了，不再有平均主義思了。這個例子幫助了我們很快地解決了問題，具體地批判了個人主義思想。

當時，我們選的教材，正是爲了講從發展變化的觀點上去看人物的思想的《拖拉機開進高家村》課文，因此，這個例子便生動有力地幫助我們解釋這個道理。他們不單不感到從發展變化上去看問題過於深奧，而且感到這是要深入生活認識事物寫好文章的關鍵。解決問題，提高認識，啓發寫作的正是這種例子所起的作用。不和學員打成一片，不熟悉學員的生活與思想情況，就無從發現這些問題，也就不可能密切地聯繫實際。

##### 乙、從學員的寫作過程中去發現例子：

有一個學員在寫一個積極互助的學員時，只抓住了互助上的一些現象：怎麼抓緊時間討論、問答、出題演算等。本來是很令人感動的一樁事，可是他寫下來平淡無味，一點也不能表現出這個同志的互助學習的熱情。“學習上的材料，實在不好寫”的論調就產生了。後來經教員一步步啓發，才發現這材料原來是這樣的：甲同志的立功計劃中有一條是幫助乙同志，使他能跟上班；而乙同志的程度却差得太遠，雖經甲同志不斷的幫助，勉強能不降班，但是負擔太重。爲了使乙同志能夠學習好，上級決定將乙同志調班學習。正在調班的前幾天，甲病了；等甲病好後回來，乙調走已經好幾天了。甲對這事感到非常難受，雖然經上級再三解釋，仍然很感慚愧，於是他提出幫助班內成績較差的丙同志，要使丙取得良好的成績。寫這材料的那個同志就是被這以後的互助精神所感動的，可是他以前的一段略去不談了，學習上的材料不好寫的論調就產生了。當時，我們正講“寫人物的思想行動必須掌握正確的根據，要找到人物行動的力量的泉源”等問題。這個例子也很生動有力地幫助說明了問題，打通了尋找材料與處理材料的道路。它使課堂教學的內容不致成爲教條，它把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不了解、不研究學員的寫作過程，就不可能發現這類問題，也就不能密切地聯繫實際。



丙、從學員的作文中去發現例子：

這是最主要的材料的來源，也是最容易搜集材料的地方，講解時使用最多的便是上面的例子。這裏我們只舉兩件。

在講“自己感動了，再溶化題材寫出來，才能感動別人”以及“思想感情及人物的本質是凝結在人物的語言行動之中的，不能先寫了事物再加上思想感情或本質”等問題時，我們先朗讀了學員的兩個作品。其一是：“××病了，他躺在床上，聽到外面有洗東西的聲音，他問：‘你在洗什麼？’‘我在給你洗屎褲子。’‘那太髒了，你放下，等我病好了自己來洗吧！’‘沒有關係，咱們是階級兄弟，這是發揚我們革命部隊的階級友愛呀！’”另一節是病人恢復健康後在回憶這件事時寫的：“我醒來後，發現剛才弄髒了的褲子不在牆角下擱着了，我正在想，忽然聽到窗外有人攪弄的水響。我連忙問：‘是誰？你在洗什麼呢？’‘是我！我在洗手巾。’這是×××的聲音：‘你醒了嗎？好，我馬上給你拿藥來’。五分鐘過去了，他還沒有來，我抬頭一看，房子裏十一條手巾很整齊的搭在繩子上，一條也不短。他哪裏是洗手巾，他是在給我洗那又髒又臭的褲子呀！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流下淚來，我們的革命同志是多麼地……。”這兩段作品一對比，顯然地學員馬上感到後一段好，能感動人。這時再來分析，為什麼後一段比前一段好，接着再把課文上擬講的部分提出來（講這點時間是結合課文《母親與家鄉》提出來的。）使學員取得更深一層的印象，然後，再把問題提出來。這樣，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存留在學員的記憶中了，同樣也使他們在寫作上得到啓示，懂得努力的方向。在講文章的真實性時，我們提出的問題是“不能以個別真實代替一般真實，文章的真實性在於合情合理，合乎事實發展的規律，寫作時要寫前因與後果的必然性”等問題。當時還有這麼一樁事：有一個同志在冬天跳到水裏救起一個小孩，自己的腳和腿都被冰碰破了，身體也凍麻了，但是他却解下自己的棉衣裹住了小孩。小孩的母親來了，把小孩抱到城隍廟裏謝城隍去了。有三個同志寫這個材料，第一個照實寫，第二個把後面一部刪去了，第三個把後面改為孩子的母親很感謝解放軍，寫成一個很動人的軍民相敬相愛的場面。這三篇文章有力地幫助我們解決上面提出來的問題。學員們認為第三篇好，有教育意義，但不真實；第一篇雖然真實，可是主題不明確，教育不了人。恰好那幾天另一個學員從河溝裏把一個掉在水裏的老鄉救了出來，那個老鄉感激得要給他送禮、照像，說他是再生父母等。救起人家的孩子會得到感謝是一般的情況，是合乎發展規律的，而感謝城隍這只是偶然的

個別現象。因此把孩子的母親寫成感謝，就不是不真實的。這個很難理解的道理，由於有了這麼一個生動熟悉的故事便一點不難，而且也使他們自己意識到是他們所迫切需要的東西了。

丁、綜合學員作文中的例子，表現得更突出、完整，能够更有力地說明問題：

學員的例子不見得都像以上所講的那麼完整、典型，能够說明問題，這就需要教員推情度理的去綜合加工，使它能够完整，能够更有力地更全面地說明問題。

在講對話與敘述時，學員中有這種作品：甲同志在該簡單敘述的地方使用了對話，乙同志把該用對話表現人物思想感情的部分粗略地寫成了敘述。這時，教員便應該把甲乙的毛病都綜合起來，把該用敘述的地方改成對話，把該用對話的地方改成敘述。這麼一來，即突出易辨別，使學員印象深刻，而且省事——一個例子說明了兩個問題。學員在寫作中時常有歪曲人物形象的情況；並且都很片面，甲寫錯了一部分，乙寫錯了另一部分，丙寫錯了第三部分。這時，就把三個人的錯誤集中在一起去講，同樣也能收到上述效果。

綜合性的例子有很多好處：第一，不至於影響原作者的情緒，（到底不全是他的錯誤）第二，能引起廣泛的警惕。（在舉這類例子時，學員最容易聯繫自己作品中的毛病。）

在舉學員的例子中，不打擊學員情緒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此，不但要舉一些有缺點的例子希望他們糾正，也要舉出一些好的去鼓舞他們，特別是一件事情的好與壞的兩種寫法，把它們一對比，可以證明學員寫好的能力，也可以讓沒寫好的同志得到啓示。

戊、從課文上去選取例子：

a. 從正在教的課文上去選取例子（根據學員寫作中的缺點去改編課文對比說明。）

在教《拖拉機開進高家村》時，有一段是通過高老品進城和他老婆吵嘴的故事，襯托出高老品的勤勞、樸實、直爽與急躁的個性的，原課文通過故事表現人物思想性格很好。假如要想講道理令學員接受，就很不容易。於是我們就把課文根據學員寫作的習慣改編成“高老品是一個很勤勞樸實的人，但也有些急躁病。一個例子來說吧：他要進城去看拖拉機，他老婆不讓他去，兩個人就吵起來了，高老品還罵了他老婆。這些都是農民思想的表現呀！”這麼一唸，學員就大笑起來。這時候讓他們對比思考，為什麼編成這樣不好，他們就能接受上述道理了。又如在講思想感情是溶化在人物的行動語言的那一課時，原課文描寫老太太的



行動，把她愛護解放軍的思想性格表現得很深刻動人。爲了讓學員更深刻地領會這一點，在講完課文之後，我們又把它改編爲：“這個地方的人民覺悟真高呀！例如那個老太太要送給我一雙鞋，我不要，她還罵我。唉！真是令人感動啊！”這麼反面一比，如上面的例子一樣，糾正了學員舊的寫作方法，指出來應走的道路。

b. 從講過的課文裏去找例子（把講過的課文裏與本文有類似或關聯的東西，提出來印證。）

在閱讀《共傘》時，課文裏有敘述老漢解放後生活的一段，（這是表現老漢熱愛祖國熱愛解放軍的原因。）這時，把已講過的《驢子的故事》裏所描寫的老漢家庭提一提，可以使他們回想起舊課裏講過的道理，加深對那些道理的領會，同樣也就使他們認識到這一課寫老漢生活的原因。另外還可以讓他們認識到：起同一作用的材料，由於故事不同，就表現爲各種不同的形式。這樣做可以打破他們企圖套公式、省事的懶漢思想，也啓發他們多注意生活。

總之：聯系實際講課的目的，是使學員能够深刻地領會教員所講的東西，把教員所講的東西不當成教條而拿到寫作中去實踐，把學員逐步提高而不使他們感到困難。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廣泛蒐集能說明問題的具體事例，把這些事例恰當地運用到各個問題中去。這樣，才能使課堂教學名符其實地成爲聯繫實際的教學。

## 二、通俗化問題：

從上面的許多例子來看，許多很難領會的道理通過實例來說明，都能使學員很深刻地領會到，因此基本上已做到了講課通俗化。但我們的學員大部分是工農出身，而教員大部分是學生出身，如果用學生的腔調向工農傳授知識，學員不但不易領會，還會感覺乾燥無味。因此，教員必須虛心地向學員學習，廣泛地搜集學員的語彙，學習他們豐富的通俗語言，運用這些語言生動地講授語文知識。這不但使學員提高興趣，而且易於領會、鞏固。例如：

①講“要調查研究，不要道聽途說”時，就改成“別聽風就是下雨，得打破沙鍋問（按“問”是借“墨”字的音）到底。

②講“不要空喊口號不作行動”時，改成“別乾打雷不下雨”。

③講“作者不要強拉人物爲主題服務”時，通過“別捏着脖子叫人說話”這句成語來說明問題。

④講“對材料‘熟視無睹’時，說成“材料把你的眼眶子都要撞腫了，你還不知道”。

⑤講“如以第三人稱寫文章，作者就不能再以第一人稱出現在文章裏”時，就說成“用第三人稱寫文章呀，自己就別到文章裏幌盪去了”。

## （五）聽故事寫故事

從寫話到轉入作文以前，運用這一方法較爲恰當，它是邊想邊寫的方法之一。

聽寫，是教員唸一句，學員寫一句，可以不費腦筋、不用組織語言，因此特別容易。而作文，既要組織故事，又要組織語言，初學語文的人就感到特別難。開始學員對作文都很怵頭，費九牛二虎之力也寫不出來；就是寫出來也往往不是語言不通，就是事情交代不清。

爲了彌補這一階段寫作上的缺陷，我們採用聽故事寫故事的方法。

具體作法是教員把準備好的故事，在課堂上進行報告，然後讓學員回憶，再根據講的故事用學員自己的話來寫。但這一方法根據學員不同的語文水平還必須分成幾個步驟來做：

### 1. 畫圖講故事：

這是爲了幫助學員回憶故事。學員寫故事時可以看看圖畫一步步地寫，就會減少他們組織故事的負擔。如××區隊講青年團員張來福帶頭搶救彈藥車的故事時，就是把故事的經過一邊講一邊畫，講到山畫山，講到水畫水，“飛機俯衝下來了”就畫飛機向下栽的樣子。有些人物的活動不能用圖畫表示時，教員就必須像演員一樣，把動作表情表現出來，使學員加深印象。這樣學員一面聽、一面看、一面想，比看電影記的還清楚。講完後再讓學員回憶一遍，或找一個學員按着圖畫的過程一步一步地講出來。記清了就可以寫。

這樣做了以後，學員不但不感到困難，而且能用自己的話把事情交代清楚，寫得還很具體。

### 2. 列提綱講故事：

隨着學員寫作能力的提高，一些簡單的故事不能滿足學員的需要，他們要寫較爲複雜的故事了。可是場面或情節較複雜的故事，不但不容易畫，而且會耽誤許多時間，因此必須利用列提綱的方法代替畫圖。講故事時，講一小段列一條提綱，講完後，讓學員回憶兩遍，再讓學員講一遍，就開始寫。

這因爲是在圖畫的基礎上進行的，學員並不感覺困難，能够寫得具體、細緻，一般能寫出六七百字的文章，而且能自然地分開段落。這樣就爲作文分段打下了基礎，也爲寫作打下了列提綱的良好習慣。

### 3. 聽故事寫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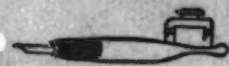
當學員能够熟練地做完第二步的時候，教員就可以在講完故事之後，讓學員自己組織故事來寫，或讓他們回憶自己的事兒來寫，於是進入了作文階段。

應注意的幾點：

（1）所選的故事必須接近學員的生活；

（2）根據學員的語文水平選擇故事，開始必須選擇比較簡單的故事，然後再逐步選擇較爲複雜的故事，不能操之過急，以免影響效果。

## 譯述



# 《語言學引論》教學大綱

(一九五一年九月)

(供國立大學語文學系之用)

蘇聯高等教育部大學總管理處批准 季羨林譯

### 一 引論(五小時)

1. 語言學作為研究語言的科學。對個別語言(或語族)的科學研究及普通語言學。

普通語言學底基本問題：語言底本質、起源、及發展規律問題；語言研究底特殊方法問題；諸語言學科底構成及相互關係問題，其對應的基本概念底內容及性質問題；語言學在科學體系內的地位。

《語言學引論》作為普通語言學底基本課程。

2. 十九世紀頭二十五年，根據語言歷史比較研究法的、科學的、歷史的語言學底產生(沃斯託可夫，拉斯克，葆樸，格里木)。

在語法方面——語言學的語法(技術的)及理論性的語法(哲學的)——對語言缺乏歷史觀點。

從發展上研究現象作為科學研究底基礎。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底奠基的主張。列寧論語言史底意義。

3. 蘇維埃語言學作為語言科學發展的一個新階段。斯大林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般地對語言學底發展特別是對普通語言學底發展有奠定基礎的意義。

### 二 語言、它的社會的本質、起源及發展

(十七小時)

1. 語言——在有人類社會以來一切階段上，交際、交換思想及相互了解底工具(列寧，斯大林)。語言是部落、部族及民族底集體底財產。“社會以外，無所謂語言”(斯大林)。沒有語言，社會就不能存在(斯大林)。

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是鬥爭及發展底工具(斯大林)。語言作為“思想底直接現實”(馬克思)。“思想底真實性表現在語言之中”(斯大林)。語言與思維之聯系問題底辯證唯物論的提法。

2. 語言不是上層建築(斯大林)。根據斯大林底學說，語言與社會的上層建築的根本區別，馬爾關於語言底上層建築性質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底批判。

3. 語言不可能是階級性的(斯大林)；甚至在有敵對階級存在的情況下，口語底階級特點也不超出習慣語底範圍(“階級性的”習慣語，同行話)。

“在語言發展底所有這一切階段上，作為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的語言是全社會統一的，共同的，是對社會所有組成員同樣服務的，而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怎樣”(斯大林)。“民族語言不是階級性的，而是全民性的，是對於民族組成員共同的，對整個民族統一的語言”(斯大林)。“語言底‘階級性’的公式是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公式”(斯大林)。關於“語言階級性”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馬爾的說法底批判。

4. 作為一個系統的語言。語言底事實之系統性(語音學的，形態學的，句法的，詞彙學的現象)作為語言底內在完整性底前提。語言是系統，而不是有機體。

5. 活的語言底方言的分化(方言、次方言、土話、次土話)。語言地理及它的原理。社會的習慣語及同行話；根據約·維·斯大林底學說，它們與地方方言的基本區別。

6. 文學語言，它的產生及發展。文學語言與方言底相互關係。

7. 語言作為歷史上變化的範疇。由於社會發展而來的語言底變化。“因此要了解某種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聯系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系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斯大林)。約·維·斯大林關於語言發展內部規律的學說。

8. 語言底詞彙經常變化。語言底穩固性作為它的語法結構及基本詞彙底穩固性底結果(斯大林)。詞彙底與“語言基礎”——它的語法結構與基本詞彙——底變化速度底差別。

9. 語言發展底基本過程：分化及同化底過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上它們的比重關係。在分化過程中新語言底產生。

語言底融合作為同化底個別的情況。約·維·斯



斯大林關於語言融合的學說。馬爾關於融合底本質與融合在語言發展中的作用的學說之錯誤見解。

語言從舊的質變為新的質的過程是由新質底要素逐漸積累，舊質底要素逐漸死亡形成的(斯大林)。馬爾底語言發展由於爆發的學說是毫無科學根據的(斯大林)。

10. 民族的與部落的語言。部族的語言。民族底建立與民族語言底形成。列寧及斯大林論民族語言。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壓迫小民族與排擠他們的語言的政策。在蘇聯各民族語言由於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實現而興盛起來。約·維·斯大林關於在社會主義時代與共產主義最後勝利的條件下民族語言發展底基本趨勢的學說。根據約·維·斯大林底學說，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勝利以後語言發展底特殊規律。根據約·維·斯大林底學說在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裏，各種語言發展成為一種語言的過程底不可缺少的條件。用人為的手段加速諸語言變為一種語言的過程，這種嘗試底反動性。

11. 現代傳播最廣的活的語言：俄語、漢語、英語、西班牙語。

俄語作為最豐富的、影響最大的國際語言之一。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諸民族間交際的全蘇語言的俄語底卓越地位。

12. 語言底起源。問題底提出：語言(口語)起源問題與個別的具體的語言底起源問題，意義並不相同。

語言起源學說底基本類型：個人主義的(聲音模擬說，感嘆說)與社會的。

馬爾底語言起源說：手勢語先出現；作為“勞動技術行為”底工具的聲音語發生較後，聲音語起源底階級性。馬爾底基本說法是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關於這個問題的原理不能相容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語言起源的學說及其主要立論：語言起源於太古時代，在“人類的”集體裏，與勞動過程有關，並且由於有用聲音語作交際的要求。

### 三 語言學底各部門及其基本概念

(四十四小時)

1. 語言底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作為語言的基礎，的特點底本質(斯大林)。語言學底各部門是在全面研究語言底詞彙及語法結構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語法學，詞彙學，語義學，字源學，形態學，句法，及文體學。

科學的語法底研究對象，構造及目的與傳統的學所教的語法相比較。各種語法：歷史的，比較的，描述的。

的。描述的語法作為歷史語法的不可缺少的出發點。

2. 語音學作為研究語言發音系統與發音變化的學問。

發音器官，它每一部分底構造與功用。發音。對發音基礎的瞭解。音響學。樂音與噪音。聲音底高度，強度，長度及音色。

3. 聲音底分類。元音及輔音。元音底分類。元音底三系列：前系，中系，後系。

輔音底分類：根據發音部位，根據聲帶底輔助作用，根據閉塞底性質來分。混合輔音。長元音及長輔音。二重元音(上昇的，下降的)。三重元音。

鼻音化，唇音化，顎音化底現象。

4. 重音：動力學的，音樂的，確定的，變動的。詞與形底重音，短句底重音，句子底重音，邏輯的重音。重音底歷史的演變。音調與它的變異。

口語底語音學的分法：短語，節拍，音節，音響。音節底定義。

5. 音變：組合的與所謂自然的。同化，異化——全部的，局部的；向前的，向後的。音素的轉位，代替，互易。弱化。由類比而生的變化。協音現象(某些語言)。

語言聲音成分底變化。親屬語言內聲音底對應性。音的規律底概念。音的規律底歷史性。

6. 在蘇維埃語言學裏關於音位的學說。在音位原理研究方面祖國科學底優越性。

7. 音變及其在字源學，語義學，形態學等事實的科學分析上之重要性。

8. 文字底起源。文字：圖畫的，象形的，分音節的，形聲的。聲音與字母。語音學的標音。正字法及其基本原理。正字法及正音法。

9. 語義學作為語言學重要部門之一(斯大林)。詞義的概念。對於詞義的傳統瞭解，認為它是見詞而聯想起來的心象，這是沒有根據的。現實底被標誌的事實(現象)作為詞義底確定因素。

列寧論詞底概括作用。詞與概念。詞與術語。成語與短語的單位。

10. 全義詞與非全義詞。積極詞與消極詞。詞義底客觀與主觀的關鍵。基本意義及其因上下文而起的變化。詞義底歷史的發展。意義底擴大，意義底收縮；機能的轉移等等。同義詞，同音異義詞，反義詞。同義詞與詞裏面各種不同的意義上的細微差別。雅詞。禁忌語。

11. 詞義學與詞彙學。基本詞彙及其在語言發展上的意義。根據基本詞彙形成新詞。“詞彙越豐富，越紛繁，那末語言也就越豐富越發展”(斯大林)。詞彙構

成底不斷的演變。與社會制度底變化，與生產底發展，與文化、科學等底發展有關的新詞底產生。陳腐的詞底死亡。文學語言詞彙與方言詞彙。不同社會集團底詞彙的特殊性。詞底假借。假借底途徑：直接的與經過別的語言底媒介的。借來的詞因其在借出的語言的詞彙中所佔的地位而有所區別。列寧論爭取文學語言底純潔的鬥爭。

12. 詞典學與詞典編輯法。詞典底類型：翻譯式的或對照式的（二種語言的，三種語言的等等），詳解的，專門的，術語的，成語的，正字法的，方言的，歷史的，比較的，字源學的等等。

13. 詞底來源與詞底歷史。科學的字源學底原理。所謂人民大眾的字源學。語音學與字源學。

14. 形態學與句法作為研究語言底語法結構的學問。

語法（詞底結構，句子底結構）作為“人類思惟長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人類思惟所得巨大成功的指標”（斯大林）。斯大林同志論語法特點的學說作為研究由詞與句的具體的物質的意義抽象得來的、詞底結構與句子底結構的學說。

詞底結構與詞底應用規律作為形態學底研究對象。形態單位底概念。詞基。詞根與附加部份。詞底形態與附加部份。形態學與構詞法。

15. 附加部分底分類：——根據其在詞中的部位——接頭部，接尾部，插入部。附加部份底分類：——根據其機能——構形的附加部份（詞形變化），構詞的附加部分（構成詞基）。過渡型的附加部份。能產的（活的）與不能產的（死的）附加部份。

16. 簡單的與派生的詞基。複合詞。複合詞底基本型式。МУ (莫斯科國立大學)，профсоюз (工會)，Гостехиздат (國家技術出版社) 等等型的縮寫複合詞。詞底形態結構方面的變化過程（再分解，簡單化）。

17. 語言的材料在機能上與附加部份有同等意義：詞基變化（所謂“內部變化”），句子裏詞的次序，重音，聲調，詞基底重複。在沒有附加部份的語言裏，語法形式底表現。

18. 語法範疇底概念。基本語法範疇：格，數，性（語法上的類），人稱，時，體，式，語態等等。語法範疇底歷史的變化（語法上的性和類，體和時）。

19. 詞與詞類底形態學上的分類。句子底要素與詞類。在語言學的語法裏（Дионисий Фракийский）與科學的語法裏，根據詞類的詞底分類原理：語義學的，形態學的，混合的。對結構不同的語言不可能製定一個統一的形態學分類法。詞的實體的與形式的意義底相

互關係。

20. 句法，它的對象與任務。詞組底結構與詞底句法聯系的基本形式：一致，管轄，歸附。句型底概念。

21. 句子及其類型。句子裏邏輯的與語法的因素底相互關係。推論底各部份與句子底要素。

22. 複雜句子。並行與主從作為句子底結合方式。概念底邏輯的，心理的與形態學的解說——句子主語，述語。

23. 各種語言句子底句法結構底多樣性，在同一種語言裏（在不同的時期內）句子結構底變化性。

24. 文體學作為研究文體的學問。藝術上與語言上風格底概念。表現工具對被表現的內容的關係作為提出有關風格問題的基本前提。文體學作為詩學底一部分與作為語言學底一部分。

文體學及其對於翻譯理論的意義。

25. 語言底分類。語言底傳統的形態學的分類。根語（沒有附加部份的語言）；黏著語與曲折語（有附加部份的語言）。多式綜合性語言。分析性與綜合性的語言。

26. 形態學類型底變化性。根據形態學的語言分類底基本缺點。把形態學類型評定為發展底高級與低級階段，在科學上毫無根據。

27. 語言的譜系分類。根據發源材料把語言底親屬關係看作歷史的順序，而不是生物學的（人類學的）順序。歷史比較法作為確定語言在起源方面的親屬關係的方法。

從語言的起源與遺傳的相互關係這種觀點上看絕大多數語言，這種研究做得不夠。

28. 研究得最多的語系：印歐語系，漢藏語系，閃語系，突厥語系，匈芬語系，伊比利亞·高加索語系。語系分為有親屬關係的語族或語支（像：斯拉夫語族，日耳曼語族，拉丁語族，印度語族，伊朗語族，以及印歐語系裏的其他語族）。

蘇聯各民族底語言。

29. 語言底階段分類法是毫無科學根據的，馬爾薩斯四要素分析法，其性質是唯心的。

#### 四 語言學在科學體系裏的地位（二小時）

1. 語言資料底複雜性與由此產生的語言學與歷史科學（歷史，考古學，人種學）及哲學（邏輯，心理學）的聯系，以及與博物學（生理學及物理學）的聯系。

2. 語言學及其對於蘇聯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發展的意義（標準語法底編著，詞典底編纂，文學語言規範底擬定，特別是正字法問題底研討，文字歷史不長的語言底字母底擬定等等）。（轉5頁）



# 本社召開新聞語言問題座談會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國語文社邀請了二龍坑報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新華通訊社、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北京日報社、工人日報社、中國青年社和一些對新聞語言很關心的語言研究者，舉行了一次座會，專門討論了一下新聞廣播語言上存在的問題。這次會開得很好，新聞語言的幾個主要問題都提出來了，並且交換了改的意見。

首先由二龍坑讀報組的代表談了談讀報時候所發現的語問題。他們說：“我們是講、讀、唸並重的，沒有一定不變的式；不過，單唸是不大懂的。唸的內容和懂不懂有關係。如‘修建黃河’、‘成渝鐵路通車’、‘荊江分洪’這些消息，聽衆不懂，不大愛聽。社會新聞就能懂個七八成。一些太文氣的眼必須用比方來說明解釋，如‘取締’、‘措施’……等。句太長了也要費工夫解釋，或者分段（二段甚至三段）來解說。什麼得改唸‘跟’什麼。”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溫濟澤先生，根據廣播工作的需要，出新聞文章必須用普通話來寫。他的意見分三點：

一、文字和語言一致的問題。廣播稿的文字應該和口語一致。聽衆懂不懂得，一方面是內容問題，一方面是文字問題。一五〇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請郭大力先生廣播講解《帝國主義論》，他寫好稿子先要唸給別人聽幾遍，把它修改到這樣的度：一唸出來，人家就能聽得懂，然後才廣播。我們有許多同寫廣播稿也用這種辦法，這是寫廣播稿的一個好辦法。今後紙上的新聞文字也要口語化才好。不過，口語化的文字也完全和說話一樣。寫好的稿子是經過組織的語言。口語本是並不簡練的，口語裏常有像“那個”、“這個”等不必要的字。口語化主要是說用普通話來寫。

二、現在的新聞電訊稿，用來廣播，有相當多的地方，是不語化的。舉幾個例子來說：

1. 文言腔調。例如：

“自七日至二十日”，普通話是“從……到……”。

“即將開始”，普通話是“就要開始”。

“旨在破壞停戰談判”，普通話是“目的在於破壞停戰談判”。

“以幾百萬英鎊備戰”，普通話是“花了幾百萬英鎊來備戰”。

2. 生硬的外國腔調。例如：“維辛斯基的論點在委員會會議廳以外也被人引用，被人用來使某些代表團相信，在板店進行談判的人們違反了國際法。”（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七日《人民日報》）這樣唸起來，就很難聽得懂。這種生硬的外國腔調是應當避免的。

3. 有些單音詞在報面上用可以看懂，用到廣播上就

不行，得改成多音詞。例如：但——但是、曾——曾經、仍——仍然……等，現在口語裏很少只說一個字的詞的。

4. 有些字看起來是白話，但是仍然不是口語。例如：“便信以爲真”，“將他捆起來”，普通話多不用，而是說“就信……”，“把他……”的。

三、歐化語法、文言、方言怎樣採用的問題。歐化不能一般地反對；毛主席、魯迅都是主張吸收外國語言裏好的東西的。“慢慢地”……等可以用；“對於”、“關於”……這些詞兒都不是漢語裏原有的，現在也用開了。但是有些歐化語法不應該用，尤其不要硬套。古代語言看怎樣用法，有些好的仍然可以用。如“豈有此理”就是；有人把它改爲“那有這樣道理”，在某些地方反而不好了。“置之不理”如果硬改爲“放在那裏不去理它”，也不如原來的順口有力。方言同樣要批判採用，主要是要用普遍性較大的。

葉聖陶先生還要去開別的會，很簡單扼要地發表了一點意見。大致上和本期《中國語文》上發表的文章意思相同。

北京廣播電台的宋紹柏先生說：“我們常常下去和羣衆見面。工人們管聽不懂的詞句和文章叫‘字兒話’。這裏面有些是由於缺乏常識才不懂的，但是大部分是可以改成口語而沒有改的。他們問：‘你們寫的時候，是不是曾經想到讓我們聽？’的確，我們有時是沒有想到的。廣播用稿一般都是要經過修改的。但是有些不容易改。例如‘毛主席設宴招待……’，要是改爲‘毛主席請吃飯……’也不大好。又如‘致哀’一類的詞，口語不常用，又沒有和它相當的詞可改。”

工人日報社的趙榮聲先生說：“我們接到過一封信，寫着，寄自徐州超滿五辦公室，原來是‘……超軸、滿載、五百公里運動辦公室’。這我們還可以猜到，一般人就不知道是什麼了。有些技術上的名詞也無法通俗化，如‘皮鞭花’，經過好多次解釋，還不一定懂得。”

俞敏先生接着發言。他也指出要把內容和語言兩個問題區別開來。他說：“‘荊江分洪’我第一次聽到也不懂，因爲自己生活不接觸。這不是語言問題。當然不是說報紙對於這點可以不管。現在報紙對羣衆熟悉的新聞，在語言上也是打了七折的，我們說‘報紙沒有很好完成《人民日報》去年六月六日社論所指出的任務’，並不算是過分。現在報紙上還可以見到陳舊的套語。例如報道波蘭籃球隊和我國球隊比賽的消息裏面，還用‘銀角一鳴’來代替‘吹哨’。另外也有繁複、喜用襯字的毛病。例如‘搬煤’寫成‘搬運煤斤’；‘坐車’本是口語，一定要加作‘乘坐車輛’。這沒話可講，就是要硬湊四個字。有些詞沒法兒改，也用不着改，像‘皮鞭花’等。”

新華通訊社的陳笑雨先生說：“報紙主要是給人家看的，能聽懂當然更好。廣播就必須使人聽得懂。這是分工。我

們的工作是有缺點的。大家的意見很好，願意帶回去改進工作。”

新華通訊社的藍鈺先生接着就舊詞和新詞、方言等問題發言。這些意見包括在本期《中國語文》上他的文章裏。

唐飛虎先生介紹《中國青年報》力求通俗化的一些經驗說：“我們的讀者主要是工廠、農村中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幹部。起初，我們有三個原則：（一）聯繫實際，（二）每篇不超過二千字，（三）儘可能避免文言、歐化。不過，事實上現在很多文章都在兩千字以上。《人民日報》在轉載了喬木同志的《短些，再短些》一文以後，是短了一個時期，但是過了些時又長起來了。我們的報紙情形也一樣。文言成分像‘與’、‘及’等，我們常改成‘和’字，但是仍然有很多。如‘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等就不好改。文言當然並不要絕對排斥。如毛主席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用了‘如此而已，豈有他哉’的文言成語，就很有力量。”

光明日報社的王達仁先生在會上提出了兩個問題：一、《人民日報》、新華社是全國性的，因此，新華社的稿子有兩套，一套給工廠、農村讀者，一套給文化程度較高的人。《光明日報》的讀者多是知識分子，是否需要通俗化呢？有的同志還提出新華社那樣做是不是浪費的問題，因為如果通俗化了，知識分子不也可以看嗎？何必另外搞一套給他們？能不能說兩套辦法就是普及和提高的問題呢？二、語法、詞彙問題。有人說，你拿語法來約束我，我就寫不好；文章不是要有獨特的風格嗎？不然就會千篇一律。這樣的意見對不對呢？

新華社的萬農先生說：“句子長了，不但聽衆難懂，廣播員廣播也費事。有些句子的加重語氣的附加語，長到二百多字，唸起來唸不斷。我們曾經規定每句不超過二十字。短句是漢語的特點之一。趙樹理、老舍的文章很受歡迎，句子短是一個原因。羣衆要短，我們主觀上也想短。只要我們留意，長句子是可以避免的。不過，把翻譯文章裏面的長句翻成短句是比較困難的，硬翻了，語法就不完全了。”

接着陸志章先生說：“不要把問題看得太嚴重。要把文章的形式和內容分開來談。如果專談形式問題，嚴重性就減輕了大半。”

無論哪一國，文語總不是和口語一模一樣的。當然我們不能脫離羣衆，不能只是面向羣衆，而耳朵和嘴不向羣衆。我們應該學習羣衆的語言。但是，語法詞彙如果完全照羣衆的話，也不是領導羣衆的正確方法。現在社會變動一年比得上過去幾十年，新的名詞一年不知要增加多少。文盲嘴裏估計至少也有上百的新名詞。因此，新名詞儘管造，不要怕羣衆學不會。比較困難的是形容詞，羣衆接受較慢，因為他們自己有一套。

漢語有沒有長句子？有。一種是條件句。如‘如果你不吃蘋果，我就不喝茶’（北京人不大用‘如果’而用‘要是’）。“如果……”也有放在後面的。第二種是在名詞動詞的前面加附加語。《紅樓夢》上有長句子，《新兒女英雄傳》更多，這都是完全中國式的，並非歐化。長句子不必怕。目前我們所講的一套和羣衆距離較遠，我們對於小學程度的人，怎樣去拉他們一下，幾年後他們就也能讀長句子了。”

呂叔湘先生發言指出：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以後，新聞語言是有了些改進。但是現在從報紙上找不妥的、錯誤的例句，並不比過去困難，這就表明現在報刊改進得還不夠。

鄭冀先生說：“羣衆語言我們必須學習，但是，同時要提羣衆。要足夠估計羣衆學習吸收詞彙的能力，不應該因陋就簡，應該把漢語內容更加豐富起來。限制句子不超過二十字，我覺得太機械。有的句子雖然在二十字以上，但是不感到長，有的句子字數雖少，也覺得太麻煩。句子長不長主要看曲折不多，不能單看字數。”

北京市廣播電台李錦榮同志介紹了廣播工作的一些經驗。廣播要看對象。如對婦女廣播，以用對話方式爲好。對學生講就要多用熱情的形容詞。方言區最好用方言廣播，中央電台的對象是全國人民，只能用北京話。廣播的時候要加些反例，如說到“……有困難”，就可以加“困難在哪兒？”

中央廣播電台劉朝蘭同志說：“通俗化不單是寫老百姓的話，還要求生動豐富一些。這當然還是要向羣衆學習。現在新聞語言之所以還不夠理想，是由於記者同志還習慣於用知識分子的腔調來寫，喜歡套用公式。有的編者同志也常常以自己喜愛爲標準來刪改稿件；記者們差不多可以預料到稿子送上去將會被刪去哪些段。這兩種現象都是不好的。”

會議最後由林漢達先生作了結語。他說：“今天的會開得很好。我們談了許多問題，舉出了很多生動的例子。新聞語言的改進問題是很複雜的，我們可以不談新聞的內容，先談語言形式。就是同樣一個意思，我們這樣說，民衆是那樣說，這裏面的區別就需要研究。現在問題不是羣衆的語言用得多了，而是少了。有人以爲用羣衆語言是遷就羣衆，降低文化水平。如果這樣想，我們就很難使我我的語文接近羣衆。我想應該糾正這種不正確的觀點：一、認爲學習羣衆的語言容易得很。老實說，學老百姓的話並不容易。非下苦功不可。二、認爲通俗化就是庸俗化。要是把通俗化看做是爲了照顧文化水平還很低的工廠、農，那就不對了。文化的水平應以文化的內容爲標準，而不是把老百姓的語言改爲文言就算是提高文化水平。通俗化不是低級化，而是走向高級去的道路。例如提高皮鞋的質量，減低皮鞋的成本，這是好的，而不是把‘皮鞋’一個詞兒轉文稱爲‘革履’，就是提高了文化。

先要向羣衆學習，充實自己，提高自己，然後才能提高羣衆。”（記者）



1. 本期的中心內容是新聞廣播語言問題。2. 以後幾期的中心內容是：（一）漢字拼音化的標準音、同音詞、詞兒連寫等問題。（二）譯名統一問題。（三）語法術語的統一問題。（四）關於字典詞典的問題。（五）語文

學的教案問題。（六）口頭文學的語言問題等等。希望語文作者能就這幾個範圍給我們寫稿子。如果能事先通信聯繫一下，我們尤其歡迎。



普文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慧先先生說，語法不要管的是：一、字眼構成法；二、的類別（便是“詞類”）；三、字眼的“性質”（便是“詞性”）；句子的成分（就是主語、謂語、賓語這一套）。（十三頁）其所要管的理由，雖然也談了一些，不過最主要的大概是因……這些‘術語’本身，也不容易了解。……賓語、表語、附，也不了解爲了什麼會有這種名稱。”（十六頁）

語法之所以要管到思想，是因為“……說話、寫話是社會的工具，所以，像‘我反對土地改革’這種話或句子，是不它存在的。”（第十頁）這麼說是在講立場觀點思想方法不是嗎？如果著者能夠明白他在第十六頁裏引的斯大林“……文法把詞和語加以抽象化，而不答它的具體的內容。”

作者也知道“語法當然不是文字學，但是，語法要管到‘錯’，並不僅限於管到錯別字，‘還要管到簡體字，同時要管字、別體字及俗體字。’（引號內引用文字見四十六頁）這來雖說語法不是文字學，但是叫人很難明白文字學還有何管的；語法與文字學還有什麼區別？

這本《語法講話》全書八十頁，可是講標點符號倒佔去十著者講的非但沒有發揮或補充出版總署公佈的《標點符法》，而且還出了毛病。例如像解釋“省略號”用法時說：“省略的部分，用省略號；表示口吃或者嚇得發抖、冷得發話不爽利的時候，也用省略號。”（七十五頁）試問在高興、或者沒有力氣等情況下，說話不爽利時是不是也可以用號呢？標點符號用法放在“怎樣學習語法？”這一講裏談，人莫明其妙。

總起來說，作者慧先先生不了解什麼是語法，而打着語法的旗號來亂談一些根本不是語法的問題。大家注意學習語法，於是就迎合羣衆的心理，很投機的搞出這麼一本書。這樣東拼西湊、錯誤百出的東西，對語法無所知的人讀了，非但不能了解語法是什麼，反而會對語法有極不正確的認識，並且對語文其它方面的問題也會有錯誤的了解。慧先先生著的《語法講話》是一本要不得的書；這種寫書的態度也是要不得的。（陳安叔）

為全國人民教育事業服務的刊物

# 人民教育

一九五三年一月號 要目

加緊學習，迎接國家建設的新任務·····	馬敘倫
全力為祖國培育新的一代·····	張奚若
祖國大規模經濟建設和青年教育·····	馬寅初
迎接國家經濟建設，提高教育工作質量(社論)	
教育行政幹部必須重視教學工作(短評)	
研究、總結並推廣優良經驗(短評)	
三年來高等教育的改進·····	曾昭掄
三年來的工農業餘教育·····	林漢達
三年來的師範教育·····	陳遷善
三年來的中學教育·····	師唯三
三年來的小學教育·····	郭林
三年來的幼兒教育概況·····	張逸園
改進人民的教育事業·····	蘇聯真理報
綜合技術教育的幾個問題·····	M·H·斯卡特金
蒙古國立喬巴山大學的一日·····	依什蔡倫

本刊內容包括教育理論論著、

教育政策闡述、教育批評、教育經驗  
總結、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教育  
建設經驗介紹、教育專門問題討論、  
教材教法研究、教育調查報導、教育  
書刊評述、教育文藝等。

是全國各級教育行政工作人  
員，大、中、小學教師，師範學校  
學生，改進工作、研討業務所必備  
的讀物。

每月五日出版

每冊3,400元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郵電部北京郵局發行

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合辦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中國語文

月刊

一九五三年一月號

第七期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語文雜誌社  
北京西單新皮庫胡同乙十二號

社長 韋 慈

編輯委員 吳曉鈴 林漢達 韋 慈  
曹伯韓 葉恭綽 葉聖陶  
黎錦熙 鄭之東 羅常培

總編輯 羅常培

副總編輯 林漢達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佟麟閣路十號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橋

發行者 郵電部北京郵局

00001-43,000

預定辦法 { 三個月三期 4,800元  
半年六期 9,600元  
全年十二期 19,200元

寄費 { 1. 平郵寄費不計  
2. 掛號郵費由定戶負擔